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刘步健

副主任 魏晓蕾 陈锋 朱杰 钱照亮

陈童

编委 (按笔画为序)

任世红 李业 吴元庆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陈思 傅佩丽

主编 陈锋

副主编 陈思

目 录

2022年 第4期 总第138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宋 好
责任编辑:鲍跃华 吉 强 王天海

统战理论与实践

- 人民政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基于江苏“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实践的分析 / 黄 杰 4
- 论“思想引领”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以新民主主义时期为例 / 王金玉 12
- 凝聚网络作家思想共识研究 / 南京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17
- 共同富裕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
——以浙江省为例 / 张佳慧 24
- 新形势下开展海外统战工作初探——以南京为例 / 郭 霖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习近平关于加强我国人民民主建设重要论述的多维探究 / 言浩杰 39
-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 柳兰芳 徐晓晴 45
- 论列宁民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 张 婷 51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 年 8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雨花英烈精神的生成逻辑: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 / 谢 军 57

新的社会阶层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创新研究 / 刘志礼 李佳隆 6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建设研究 / 高 静 张 悦 67

正学论坛集萃

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助力海内外情感融合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 / 本刊编辑部 72

学习与思考

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原则、境遇及有效路径 / 王万奇 贺伟华 77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2 - 04

人民政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基于江苏“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实践的分析

黄 杰

摘要: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是人民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是江苏政协依托既有党政体系,通过下沉资源实现的协商制度创新。与以往地方政协创新的实践相比,“有事好商量”已在平台建设、议题选择、协商流程、结果反馈等方面初步探索形成一整套的运行机制。由于充分利用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优势,“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既帮助基层政协实现了工作的下沉,也激活了基层协商的治理效能。作为一项地方性的制度探索,“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不仅具有鲜明的江苏地域特色,同时也蕴含普适性的价值,具有制度扩散的潜能。

关键词:政协协商;基层协商;基层治理;有事好商量

中图分类号:D6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04-08

2020年9月14日,在江苏连云港高公岛渔港停泊的一艘普通渔船上,举行了一场主题为“解决高公岛渔港海水污染源问题”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周边社区负责人、政协委员、党员代表、渔民代表、街道环保所、渔业办公室、码头管理站负责人等10余人围坐一圈,开展了零距离协商。会议中,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通过充分协商达成了共识,提出了若干可行措施。会后,协商结果经街道党工委研究后被批转至相关部门、单位负责落实^[1]。

这场渔船上的协商议事会是近年来江苏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探索政协协商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新形式,拓展政协协商参与面,扩大界别群众工作覆盖面”^[2],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率先关注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组织推动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

作为近年来江苏政协工作的品牌项目,“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有机融合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

收稿日期:2022-06-19

作者简介:黄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及地方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型政商关系视野下‘民企二代’统战问题研究”(19CZZ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商两种协商民主的形式,不仅丰富和拓展了基层政协的工作内容,也促进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取得了助发展、惠民生、聚共识、促和谐的明显成效。本文以江苏省“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为样本,关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机制和政治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有事好商量”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它对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有何影响?未来应如何进一步优化运作?

一、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实践基础,已经深深嵌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以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七大渠道构成的协商民主体系。其中,政协协商主要依托各级人民政协展开,基层协商则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展开。由于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和现实的社会需要,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在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最为显著,是当前协商民主领域中最具活力的两种形式。

然而,即使如此,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利益分化愈加多样化的新发展阶段,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也亟须创新和拓展,以恰当的资源整合实现更大的治理效能。具体而言,作为我国唯一的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传统上被认为是主要面向社会各界的精英群体,协商的内容通常是有关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宏大议题。尽管这一精英化的协商形式在中上层确实是有效的,但在基层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源一直存在“基础工作薄弱、人员力量薄弱”的结构难题^[4]。“两个薄弱”的问题导致了基层政协结构与功能上的“悬浮”:既不能像上级政协那样发挥精英吸纳和政策智囊的作用,同时由于长期以来与上级政

协功能定位的同质化,导致其虽身处基层却并不善于做基层工作。普通群众对政协感觉陌生,基层政协作为基层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无法发挥^[5]。

另一方面,基层协商尽管经过20多年的探索,在各地已经呈现四面开花的弥散化发展态势,但也由于制度化程度低等问题而深陷发展瓶颈。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当前各地的基层协商大部分是“矛盾冲突和治理困境倒逼的结果”^[6]。这就意味着它们多数开始时只是基层政府的临时性措施,缺乏顶层的制度设计。尽管后期有不断的制度完善,但总体上其规范化程度较低,特别是在利益相关者范围、协商流程及结果反馈上均有相当的模糊性。与此同时,基层协商的组织者也呈现高度多元的特点,既有财税、民政等政府部门,也有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基层团体。由于缺少必要的协调,不同部门组织的同一议题的协商叠床架屋,不仅没能为基层解决问题,有时甚至还增加了基层的负担^[7]。这些特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基层协商的实际效果,最终影响了基层协商的公信力和可持续性。

由此可见,无论政协协商还是基层协商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着不少的挑战。破局的关键之一在于“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8]。事实上,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不同的协商渠道对应不同的领域,实现不同的目的,本身有其正当性和可行性,然而过分强调各渠道的独立性则不可避免会削弱协商民主的整体效应^[9]。就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而言,则需要正视它们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某种合理的机制设计加强它们的衔接互动,实现双向赋能、优势互补。在这一方面,过往各地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实践和探索,但始终缺少真正有影响力、可持续的品牌项目。江苏政协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是近年来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品牌项目,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新时代民主协商的新路子。

二、“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的运行机制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有事好

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江苏省政协于 2019 年以徐州和南通为先行试点，组织探索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并于 2020 年起向全省全面推广。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已经成长为江苏省政协的品牌项目，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回顾“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本质上是地方政协依托既有党政体系，通过下沉资源实现的协商制度创新。与以往地方政协创新的实践相比，“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已初步探索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在平台建设、议题选择、协商流程、结果反馈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

（一）精心设计的协商平台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的发展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及政协的精心设计。中共江苏省委在《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建设‘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或政协委员工作室，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联起来’等方式，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省政协注重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成立“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指导小组，对全省“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的规范化建设、常态化运行进行了明确指导。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已建立“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 21,315 个，其中乡镇、街道覆盖率达 100%，行政村、社区覆盖率达 80%，省级以上园区覆盖率达 99%；在企事业单位建立协商议事室 911 个；建立界别协商议事室 1021 个，覆盖率达 61%^[10]。

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建设的过程中，江苏各级政协特别注意资源整合和集成利用。一方面，在基础配置标准化的前提下（有统一标识、有固定场所、有必要的设施设备等），特别强调不另起炉灶、不增加基层负担，坚持“一室多用、功能合用”，依托乡镇、街道、园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等现有资源，建设协商议事室。另一方面，在平台日常管理运作上，一般由担

任政协委员的乡镇、街道、园区党委（党工委）副书记兼任政协工委主任或委员履职小组召集人，组织并主持协商议事活动。市县政协委员按照就近方便原则，编入各乡镇、街道、园区协商议事室，并被要求每年至少参与 1-2 次基层协商议事活动。

（二）贴近现实的协商议题

决定协商议事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选题。传统政协协商议题通常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宏观问题，离普通群众日常生活较远，不易引起群众关注。由于需要直接面向基层群众，“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克服这一问题。在选题上，采用党委或政府点题、政协委员荐题、当地群众出题等方式，聚焦当地党政关注的要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注重选择切口小、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开展协商议事，使得协商更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以连云港市政协 2020 年选编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典型案例为例，其中绝大部分是有关当地百姓民生的议题，如农村厕所改造、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空巢老人助餐、中小学周边交通拥堵等^[11]。

协商议题直接影响协商主体的范围。根据省政协要求，确定协商主体时，要“坚持利益相关者参与协商的原则，最大限度调动各方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协商的积极性”^[12]。在实践中，各地充分考虑议题类型、涉及范围、复杂程度和参与对象的广泛性、代表性，既组织政协委员、利益相关方、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代表人士参加，同时还邀请党政机关代表、专家学者等共商共议。例如，常州明确协商议事会议中利益相关的群众代表数量不能少于协商主体的三分之二；宿迁发挥乡贤威望高、熟悉情况的优势，组织 5000 多名乡贤和 1500 个乡贤组织参与协商议事；江阴吸收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参政议政能力强的机关事业人员、企业家、新社会组织代表、法律工作者等参与协商^[13]。

（三）标准规范的协商流程

完整规范的程序是制度长期运作的重要条件。江苏各级政协在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建设过程中，充分重视协商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例如，徐州市政协在全市范围建立统一的程序化工作机制，分为确定议题、确定人员、明确主题、商前调研、开展协商、报送成果、转化落实、评估质效等关键环节。镇江市政协出台工作手册规范协商议事程序，具体包括议题提出、议题筛选、议题确定、议题公示、做好会前准备、宣读协商议题、组织互动协商、达成共识、鼓掌通过、提请研究确定、结果落实环节。如东市政协则联合南通市质标中心在全省率先出台《“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工作指南》行业标准，对“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基本原则、协商形式与协商程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4]。

标准规范的协商流程有助于提高协商的质量。特别是各地政协都明确要求“无调研不协商”。协商前各地政协要组织政协委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围绕协商议题，通过入户走访、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摸清与议题相关的政策规定、实际情况和利益相关方的愿望诉求，夯实协商议事的民意基础，形成解决问题的初步预案。前期调研的成果，则被要求通过政协网站、委员履职APP、委员微信群和政务公开栏、征求意见书等多种方式提前告知参与协商的人员，为尽可能达成共识做好准备。正式协商中，优先安排群众代表发表意见，倾听利益相关方的不同利益诉求，支持讲真话、道实情，促进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多向沟通交流，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

（四）注重实效的协商反馈

协商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特别注意建设完整的协商议事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积极推动协商成果转化成为党委、政府的决策，努力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具体而言，协商完成后，协

商议事室要及时形成简明扼要、切实可行的协商建议清单报党委政府；基层党委政府和党政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协商建议办理工作，及时研究制定责任落实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待完成后，及时形成结果反馈清单，采取适当形式向参与协商的主体及相关群众公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对不具备条件解决或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党委、政府、政协等部门则需及时做好释疑解惑、理顺情绪的工作。

受益于这一严密的结果反馈机制，“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获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省各级各类“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开展活动4.74万场次，累计77.03万人次参与，收集协商建议6万多件，解决5.29万个老百姓身边的问题^[5]。一大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获得党委、政府的关注，得到妥善解决。例如，南通市崇川区小海街道就小区电瓶车充电设备不足问题，组织居民、物业、消防等展开协商，协商结果推动社区新建符合消防标准的停车棚30余间，总占地面积671平方米^[6]。泰州市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园区内外来员工住宿困难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园区负责人、员工代表等展开协商，协商结果加速了开发区蓝领公寓的建设^[7]。

三、“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的制度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对于如何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各地仍然缺乏十分明晰、可行的思路。江苏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成功的样本。它是在政协主导下，通过聚焦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机融合。就政治影响而言，由于充分利用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各自的优势，“有事好商量”已经逐步成为江苏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它既帮助基层政协实现了工作的下沉，也激活了基层协商的治理

效能，同时还在无形中形塑了基层的政治文化。

（一）基层政协工作的新抓手

如前所述，人民政协虽然是我国唯一的专门协商平台，但一直以来饱受“下不着地”问题的困扰，在基层缺乏影响力：在组织架构上，政协的最低层级委员会设在县区一级，在此之下并无政协的组织力量；在工作对象上，政协主要面向社会各界精英，关注国家宏观的政治经济议题，远离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的实践缓解了政协的这一尴尬状况，为政协工作向基层拓展创造了条件。具体而言，一方面，“有事好商量”在不改变既有基层治理格局的前提下，通过打造覆盖基层（街道、乡镇、园区及基层社区）的协商议事平台，完成了政协组织力量的扩展。另一方面，在协商内容上，“有事好商量”聚焦于解决切实的民生议题，改变了基层政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软、大、空、虚”问题，拉近了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在政协工作向基层拓展的过程中，基层政协委员角色的转变尤其值得关注。理论上，与人大代表一样，政协委员被定义为党和政府与普通群众间的桥梁和纽带，其责任是“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各级政协长期着眼于“上”的工作状态，基层政协委员与普通群众的联系较弱，反映社情民意的积极性不高。特别是由于基层政协工作形式单一，出现了所谓“月主席、季常委、年委员”的状况^[18]。“有事好商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基层政协委员的工作模式：他们大部分人被就近编入基层协商议事室，并被要求经常性参与基层协商活动。由于要直接面向基层群众，政协委员有更大的动力深入基层开展调研。这不仅充实了基层政协的工作，也密切了政协委员与普通群众的联系。

（二）基层协商民主的新形式

除了拓展基层政协的工作，“有事好商量”也丰富了基层民主协商的形式，强化基层协商的

影响力。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基层协商民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由于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越来越多样化，基层社会内部矛盾冲突及潜在的各类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党和政府工作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生活状况的改善，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平的容忍度降低，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19]。面对这些变化，已有的许多基层协商，特别是社会自发组织的协商，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们本意虽然希望利用协商来化解社会矛盾，但往往因为协商组织者本身与党政部门沟通不够，出现“重协商、轻落实”的现象。许多问题商而不决，最终削弱了基层协商的公信力和感召力。

“有事好商量”通过引入政协因素提升了基层协商的实效性和回应性。具体而言，“有事好商量”是在政协主导下，党政部门、人民群众等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平台。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政协具有位置超脱的优势。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但又并不直接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相比其他机构，由政协主导基层协商，既可以保证权威性，又能避免直接的利益冲突。同时，受益于与党政部门的密切联系，政协还能使协商结果直接进入党政决策的视野，避免了“商而不决”的问题。正是由于政协的这些优势，“有事好商量”得以能真正化解基层的各种复杂矛盾，既改进了政府决策，也回应了民生需要，并逐步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三）基层协商文化的“养习所”

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有事好商量”也在形塑基层的协商文化。众所周知，良好的制度运作离不开特定文化的支持。基层协商民主也是如此，需要社会中道温和的文化支持，否则不仅不能化解矛盾，还有可能人为制造更多矛盾。然而，中道温和的协商文化并不是天然就有或凭空产生的，它很大程度上是协商实践的产物^[20]。就江苏的情况看，“有事好商量”本身便是培育这种中

道温和协商文化的重要“养习所”。正如各地协商规则中普遍要求的，协商活动要本着“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的原则，“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21]。参与这样的协商活动本身就是一次生动的民主教育，可以帮助参与者切实体验协商民主理性与包容的魅力。

更进一步看，中道温和的协商文化也是良善的基层社会治理所不可缺少的。它不仅是协商议事运作的重要支撑，也是协商议事之外各类社会矛盾化解的“润滑剂”。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许多地方将“有事好商量”工作作为推动基层社会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建设的重要部分，着力培育全社会协商议事的风尚。例如，泰州市海陵区利用辖区内名胜古迹众多的优势，依托老旧建筑打造了一批协商议事的“亭廊园道”，展示协商议事规则、协商成果转化及社区公约等内容，将协商文化延伸到田间地头^[22]。连云港市灌云县将倡导勤俭持家、促进邻里和睦、抵制赌博陋习等作为村规民约协商重点，发动全民参与、开展全民协商，让群众以实际行动参与“移风易俗”，争当文明模范^[23]。可以说，中道温和的协商文化已逐步浸润社会各个方面。

四、存在的不足和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以上分析显示，作为近年来江苏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创新品牌，“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在过去两年多的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毕竟还只是一项新生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就目前各地的实践看，问题主要涉及平台的定位、平台的运作、协商主体的能力等。未来“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制度的建设需要在这些问题上有所改进和完善。

首先，不同基层协商平台间关系需要厘清。在“有事好商量”逐步成长为江苏基层社会协商的主要平台的同时，基层社会仍有不少其他部门

主办的协商平台（乡村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等）存在。尽管多中心运作能增强基层治理的活力，但不同平台常常就类似的议题开展协商，本身也可能徒增基层负担，造成资源浪费。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将“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明确定位为基层协商的枢纽平台，而将其他既有的基层协商融入其中，或是依托“有事好商量”展开，或是作为其子品牌运作。在把牢政协性质定位，把好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边界的前提下，这一做法契合“有事好商量”资源整合和集成利用的原则，既可以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权威性优势，又可以提高协商议事的灵活性和在地性。

其次，政协基层协商平台的力量需要充实。尽管江苏各地已经初步建立了覆盖基层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但总体上这些平台的可用资源十分有限。在街道、乡镇一级的实际运作中，真正负责“有事好商量”日常运作的只是兼职的党委统战委员，人力物力资源都相当匮乏。也正因为基层平台资源不足，导致一些地方协商议事有“形式化”运作的倾向：“协商议题没有事先充分调研，没有深入群众了解社情民意，仅仅看个现场、开个会议，或者把年度政协工作计划中的一个视察议题作为一次‘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动，草草应付了事。”^[24]当务之急，在加强对协商过程的监管外，应进一步充实“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的力量。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为其配置专职工作人员，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最后，要提升协商主体的协商意愿和能力。由于“有事好商量”直接面向普通群众，关注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实实在在的问题，因而普通群众的参与十分关键，直接影响协商议事的效果。尽管当前“有事好商量”的各种活动都会邀请利益相关的群众代表参与，但他们的文化程度、思想认识、政策水平参差不齐，对待协商活动的态度和参与协商的热情也不尽一致，个别只是被动要求参与，并不积极发表意见。没有了普通群众的积极参与，基层协商便失去了灵魂。因此，从

基层协商的长远发展看,有必要在基层社区加强对“有事好商量”活动的宣传力度,提升普通群众对“有事好商量”的认知,激发他们的参与意愿。同时,也应面向普通群众,不定期地组织各种类型的协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以提高他们参与协商的能力。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25]“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是江苏政协贯彻落实党中央“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要求,探索政协协商同社会治理相结合,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具体表现,是近年来江苏基层政协工作创新的一大亮点。通过对江苏各地实践的分析,本文发现“有事好商量”本质上是地方政协依托既有党政体系,通过下沉资源实现的协商制度创新。由于充分利用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优势,“有事好商量”既帮助基层政协实现了工作的下沉,也激活了基层协商的治理效能,同时还形塑了基层的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重视地方治理创新的拓展和推广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大量的全局性制度变革最初都源于地方性探索^[26]。作为一项内生的制度创新,“有事好商量”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江苏地方特色,受在地环境(如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高效有为的地方政府等)的影响很大。然而,在地域特色之外,“有事好商量”也蕴含着大量超越本地区、具有普适意义的经验和启示,如务实的选题、完整的程序、严格的结果反馈等。这些都是基层政协协商能够真正发挥治理效能的关键。最近,一些省市在借鉴江苏经验的基础上,移植了“有事好商量”制度,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下一步,我们应当在完善“有事好商量”制度的基础上,加强对普适性经验的提炼

和推广,以求为政协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贡献更多江苏智慧。

参考文献:

- [1][10] 方思伟. “有事好商量”激发基层治理新效能 [N]. 新华日报, 2021-10-25(1).
- [2] 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EB/OL]. (2021-08-13). https://www.gslzxx.gov.cn/art/2021/8/13/art_11757_1037704.html.
- [3][2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22(2).
- [4]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9-21(2).
- [5][19] 董明. 新时代赋能基层治理的地方政协探索: 基于浙江“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分析 [J]. 治理研究, 2021(4): 71-81.
- [6][9] 韩志明. 理性对话与权利博弈: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比较分析 [J]. 探索, 2018(5): 51-60.
- [7] 何包钢. 通往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的新路径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164-167.
- [8]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5-02-10(2).
- [11]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典型案例 [EB/OL]. (2021-12-06). <http://zx.lyg.gov.cn/lygszx/jcxsl/jcxsl.html#>.
- [12][21]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关于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试行) [EB/OL]. (2020-08-12). http://www.jszx.gov.cn/yshsl/zdgd/202008/t20200812_32241.html.
- [13] 刘影. “为民”在心中“协商”显智慧: 全省政协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纪实 [J]. 江苏政协, 2020(7): 14.
- [14] 陆海燕.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推进路径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4): 36.
- [15] 李前进, 杨洋. “有事好商量”: 基层协商民主的江苏实践 [N]. 新华日报, 2021-10-26(13).

- [16] 规范停放电动车防范于未“燃”[EB/OL]. (2021-12-06).
<http://zx.nantong.gov.cn/ntszx/xsal/content/ddb4fa22-5f21-40f3-b7ca-027e9169f2fc.html>.
- [17] 解决区内企业外来员工住宿问题[EB/OL]. (2021-01-08).
<https://mp.weixin.qq.com/s/FVm0ZMdLMntVwtJkd5WNIg>.
- [18] 黄杰. 中国式协商民主: 以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为例[J]. 学海, 2020(5): 51.
- [20] 赵秀玲. 论基层协商文化的培育和成长[J]. 东吴学术, 2017(5): 5-11.
- [22] 钱宏伟, 储陆萍, 郭杰. “海”纳众智“陵”聚共识: 泰州市海陵区政协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纪实[J]. 江苏政协, 2021(11): 48.
- [23] 灌云县政协. 培育协商文化彰显基层协商活力[J]. 江苏政协, 2022(3): 40.
- [24] 徐冬青. 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对推动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3): 45.
- [26] 韩博天. 红天鹅: 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3-13.

责任编辑: 王天海

论“思想引领”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以新民主主义时期为例

王金玉

摘要:《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大历史宝贵经验之一,充分肯定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从根本上说,统一战线解决的是人心问题,而人心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的是思想问题。新民主主义时期,基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准确把握,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引导和教育广大工农群众、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巩固,群众基础不断扩大,最终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引领;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12-05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宝贵经验之一,既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法宝”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彰显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的重大意义。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从思想引领视角审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建设,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思想引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内在要求

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决定了新的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和先进性。所谓先进性,是指新的思想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潮流,因而也决定了其更大的影响力和包容性。马克思在描绘法国大革命时指出,处于第三等级的法国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借助罗马共和国的亡灵和法国最广大的工人、农民以及最下层人

收稿日期:2022-06-02

作者简介:王金玉,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意识形态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总体逻辑研究”(20ZDA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人学视域中的正义观及当代价值研究”(18YJA720013)的研究成果。

民的力量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这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话语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自由、平等、博爱等体现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强烈愿望，相较于君权神授等封建等级思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无疑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包容性，因而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社会。然而，当资产阶级确立其统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也显示出狭隘性、虚假性。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的，当资产阶级在人民的拥护和推动下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时，被包裹在抽象口号之下的狭隘的阶级利益便赤裸裸地显现出来，而当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曾“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的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这表明，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和小资产阶级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家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1]。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是消灭阶级统治，实现劳动人民的自由解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现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因而必然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响应。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时刻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这是因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共产党人在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时，“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共产党人视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而同其他政党组成

联盟，例如，在德国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2]。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必须团结一切人民大众，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与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革命，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从过去请来亡灵，而是从未来汲取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词藻”^[3]。为了破除一切旧观念，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

从认识论角度，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还在于正确认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统一战线指的是不同阶级阶层或团体的联合。统一战线之所以可能，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和相应的主客观条件。首先在于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切联合的基础。但是，正如唯物史观揭示的，一定的社会阶级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其利益也存在着差别。而利益本身又存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差别，由于受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人们往往难以穿越受各种利益驱使的意识形态迷雾。列宁的灌输论充分体现了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列宁在1895年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就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运动时，必须“承认自己并不脱离工人运动，因为工人阶级有自己的、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能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4]。

二、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把握统一战线的性质作为思想引领的切入点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所谓思想引领，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和把握统一战线的本质、目标和任务，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服务于党的奋斗目标。纵观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统战历程，思想引领的切入点首先体现在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识和把握统一战线的性质、目标和任务，在统一战线内部强调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党员、工人阶级群众、革命战士等。同时，也重视社会主义思想对其他人民群众，如农民、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这对于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力量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引领力，其依据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判断。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革命既相互区别，不能混淆，又相互联系，不能割裂，因此，“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既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中，“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5]。新民主主义阶段，由于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绝不是一天就长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在由各阶级、各党派和各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中，

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在坚持中国共产党思想底色的同时，保持并不断增强其政治底色。同时，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想引领的切入点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正确分析和把握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任务，并以此制定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应的战略和策略。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由于中国民主革命还未完成，无产阶级还不能单独领导革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必须加入民主革命战线，推翻公敌封建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共同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大革命失败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今后向他们作战的力量，不但要集中工人阶级自己的势力，而且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结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向共同的敌人作战”^[6]。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依靠最广大工农群众，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核心，包括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革命力量在内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采取使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根本原则，努力促成建立了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和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

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在这一根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坚决抵制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7]。由此，中国共产党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领导独立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统一战线内部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而取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彻底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终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8]。唤起民众靠的是先进思想的引领，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力量唤起民众，从而获得了取得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

三、加强文化统一战线建设以增强先进思想的引领力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思想引领的作用还突出体现在充分发展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即文化统一战线。一方面，用文学、艺术等宣传新文化，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旧文化。另一方面，用新文化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引导人民，巩固和

加强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统一战线的作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大肆扼杀新生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宣传封建法西斯旧文化。中国共产党团结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成立了以鲁迅为核心人物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统一战线，第一次确立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用文学、歌声、音乐等方式向旧世界开火，向敌人开炮，影响和激励了无数工农大众和革命青年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去，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有广泛影响的文艺作品，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等，成为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秉持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的原则，努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共产党强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的支配性和指导性地位，认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同时，又指出了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而非社会主义性质，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因此，不能把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当作指导整个国民文化的方针。但是，“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正如“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9]。

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先进思想的引领力以增强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是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从思想引领视角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不断创新统一战线的话语体系、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以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力以及对多元价值观的引领力，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大合力，无疑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中之重，也是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之于当代的最重要的时代启示。

参考文献：

- [1][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9、66、473.
- [4]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 [5][7][9]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5-686、538-539、704-705.
- [6]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6.
- [8]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2.

责任编辑：鲍跃华

凝聚网络作家思想共识研究

南京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摘要: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网络作家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文化内容的生产者,是互联网信息创作和传播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头部网络作家不仅具备内容生产能力,也具备舆论传播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将网络作家这一群体凝聚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舆论引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对此,本课题组在开展南京市网络作家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就如何更好地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作家;统战工作;凝聚共识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17-07

一、网络作家群体的现状分析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国精神的弘扬与文艺问题联系起来,强调了文艺的凝聚人心的政治功能,并且明确提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1]网络作家是内容的生产者,是互联网信息创作和传播的重要群体。头部网络作家不仅具备内容生产能力,也具备舆论传播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需将网络作家这一群体凝聚在党的周

围,发挥他们在舆论引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南京网络作家群体画像

目前,南京市内有较高知名度和作品积累的网络作家,均聚拢在南京市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中。该委员会于2018年11月成立,成立时会员为92人,其中中国作家协会成员8人。该组织成立后起到了示范与聚集效应,已吸引南京市内的网络作家189人。

为调查南京网络作家现状,本课题组依托南京市作家协会微信群,向网络作家发放在线调查问卷,收到有效答卷107份。需说明的是,本次调查对象为户籍在南京,或长期生活在南京的网络作家,并非指签约于南京网络文学平台的广大外地网络作家。

收稿日期:2022-05-18

作者简介:课题执笔人为周丽,网络作家(笔名“赖尔”),三江学院网络文学学院院长、文学创作三级;薛旻,南京市委统战部新阶层处副处长;张婷婷,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张天一,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葛飞飞,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辅导员;张丁心,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调查显示, 男性网络作家占比达 56%, 女性占比达 44%; 全职写作的占 52%, 兼职写作的占 48%。其中, 大多具有专科与本科学历 (见图 1), 年龄集中在 25-35 岁 (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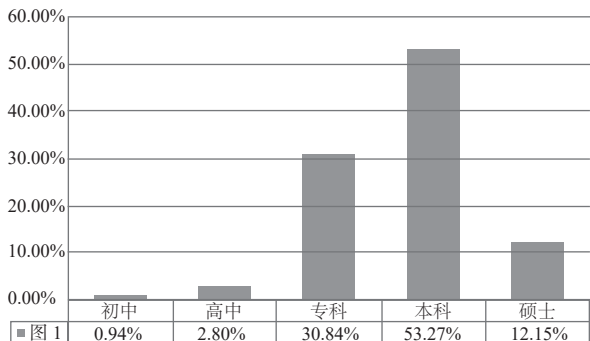


图 1 南京网络作家的学历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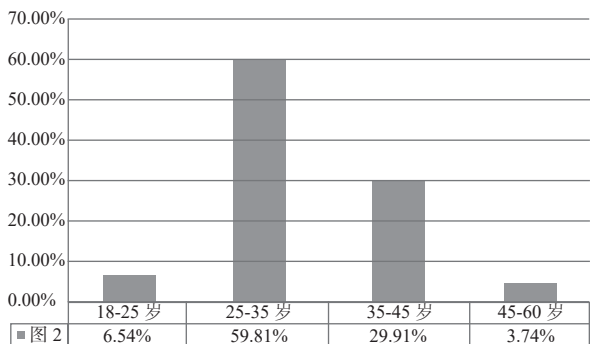


图 2 南京网络作家的年龄分布

在收入方面, 南京网络作家中, 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的占 18.69%, 月收入在 5000 元至 20,000 元的占 44.86%, 月收入在 20,000 元以上的占 36.45%。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本次调研对象来自南京市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 他们在创作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 其收入在网络作家群体中相对较高。

在创作内容上, 南京网络作家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都市、言情、玄幻等领域, 而对科幻、历史、悬疑、二次元等创作类型也有涉猎, 但无人进行体育题材的创作。本次调查发现, 南京网络作家的创作方向不同、创作内容分化明显, 体现为精品 IP 创作和免费无线创作两种截然不同的目标定位。具体来说, 精品 IP 创作方向一般是二十万字到百万字的作品, 主打动漫、影视、游戏改编等,

故事创作相对精巧, 而且题材和立意的选择也相对慎重。免费无线创作方向定位于掌上阅读, 以手机等移动终端为传播载体, 一般都是百万字、千万字的长篇作品, 依靠读者订阅、打赏获得收益, 或是提供给读者免费阅读, 依靠流量获取广告费。这种类型的网络文学以讨好读者、吸引读者眼球为第一要义。两种创作方向的区别, 让网络文学作家的创作目的存在强烈的差异: 前者为精品化创作, 孵化周期长, 能有长效的影响力; 后者有极强的下沉影响力, 下沉受众广, 收益的爆发力强。

在创作动力上, 南京网络作家的写作缘由大多是对文学的个人爱好, 其次是看好行业前景, 再次是期待有收入补贴家用。另外, 少部分人认为网络文学创作的就业门槛低、工作时间灵活 (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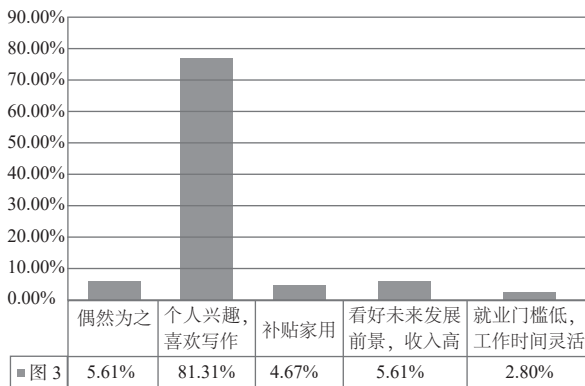


图 3 南京网络作家的创作缘由

(二) 南京网络作家组织化载体的建设现状

在网络文学平台方面, 南京市内主要的文学网站有 3 家: 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的红薯网 (秦淮区)、成立于 2013 年的酷匠网 (鼓楼区)、成立于 2017 年的连尚文学 (建邺区)。在网络文学研究与教育方面, 三江学院是中国第一家开办“网络文学编辑与写作方向”的高等院校, 该校与江苏省作家协会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了“江苏省网络文学院”。在网络文学评论方面, 江苏省作家协会与南京师范大学于 2021 年 5 月 9 日成立了“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在产业方面, 南京有

两个网络作家园区：2018年11月18日正式挂牌的“江苏网络文学产业园”（江宁区）、2019年1月28日开启首期载体启用仪式的“江苏网络文学谷”（秦淮区）。

虽然各地政府部门试图用载体化建设吸纳网络作家，但实际上收效甚微。网络作家更愿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等行业协会，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而参与线下载体的意向不强。这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网络作家以“宅家”创作为主且线下社交能力不强；二是头部网络视频平台、国内影视、动漫公司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其他城市网络文学产业园区虽然吸引了少部分企业，但无法形成集群效应，因而整体吸引力不高。

（三）网络作家的社会影响力分析

1. 网络文学作品的读者数量众多，作品蕴含的思想内核影响力大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6亿，占网民整体的46.5%^[2]。这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网民中近半数是网络文学的粉丝。

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流传更广、社会影响力更大。数据显示，网络文学的作家与读者遍布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小城市网络文学下沉用户日益增多，呈现出我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近年来，南京市网络作家积极响应号召，创作重大题材的主流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例如，网络作家周丽（笔名“赖尔”）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创作了《我和爷爷是战友》《女兵安妮》等弘扬爱国主义情怀的作品，作品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等主流奖项，并被改编成电视、电影、动画等多种文化产品；网络作家王强（笔名“王鹏骄”）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以抗击新冠疫情为背景，创作了医疗题材作品《共和国医者》，获得了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重点扶持。

2. 网络文学作品经产业化发展后，受众数量更加庞大

自2013年以来，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市场规模持续平稳上升。2020年，中国数字娱乐核心产业规模达6835.2亿元，其中，网络文学间接或直接影响了动漫、影视、游戏、音乐、衍生品等合计约2531亿元的市场，网络文学及其IP运营对数字娱乐产业的影响范围超过40%^[3]。

网络文学正从一维走向多维，网络文学与声音、绘画、表演相结合，形成了有声小说、动漫、影视等多维度的表达方式，不断扩大网络文学的受众面，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影视，为网络文学带来了出圈、破圈的强大生命力，让网络文学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也受到了主流认可。例如，网络文学作品《庆余年》，其书粉推荐值为380万，而其电视剧版的有效播放量在2020年8月30日即突破亿人次。

3. 网络作家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广泛，易引发网络舆情

网络作家往往是互联网的活跃用户，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较多。大多数网络作家都曾利用微博、微信、知乎、B站等平台进行社会事件的讨论。本次调查以“您是否愿意利用微博、微信、抖音、B站等互联网平台参与讨论公共事件”为题了解网络作家参与网络讨论的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南京市网络作家有一定的网络讨论参与意向。其中，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一共占37.39%；表示“一般”的占45.79%；而表示“不愿意”和“非常不愿意”的，合计仅占16.82%（见图4）。

就头部网络作家而言，他们以书粉为基本盘，拥有数十万或上百万粉丝，往往能在社会事件的评价上发出较大声音，进而引发网络舆情。例如，全国人大代表、《芈月传》作者蒋胜男，在2021年3月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提出“建议非法代孕相关组织从业者入刑”的提案，该话题在微博上

获得 3.5 亿人次的阅读量和 3 万条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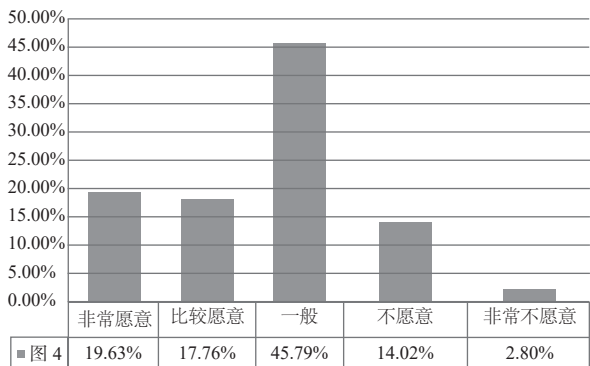


图 4 南京网络作家参与网络讨论的意向

(四) 网络作家面临的困境

课题组与接受调查的网络作家进行了深度沟通，了解现阶段他们面临的困境（见表 1）。

表 1 南京网络作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多选）

面临的主要问题	人数	比例
盗版	70	65.42%
霸王条款	76	71.03%
行业不完善	72	67.29%
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不完善	50	46.73%
话语权低	63	58.88%

1. 存在侵犯著作权的问题

在著作权方面，网络作家普遍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霸王合同。网络作家与平台签约的形式，一般分为“作者签”和“作品签”两大类。“作者签”是指作者在规定时期内的所有作品必须在签约平台上发布，作者其他相关权利归属平台方；“作品签”是指某作品在规定时期内仅可在签约平台上发表并获利。两种签约形式的时间，短则十年，长则五十年甚至永久。除了头部作家，大多数的网络作家在平台面前缺乏话语权，面对“爱签不签”的霸王合同只有妥协。二是盗版问题。防盗版工作一直是各大平台的难题。在互联网空间，存在大量的盗版网站，用户可以通过盗版观看作品而无须付费，损害了网络文学作家的经济利益。由于盗版市场规模大、违法成本低，在网络文学这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盗版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显

示，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 288.4 亿元，盗版损失规模达 60.28 亿元。

2. 行业规则不完善，网络作家在产业中的话语权低

网络文学的创作和产业化过程中，普遍涉及以下组织或个人：内容源头方、版权经济方、版权使用方、创作者工会、第三方评论组织、创作软件/工具运维方。其中，网络作家作为创作源头，其话语权在整个行业最低。除头部作家以外，大部分网络作家在文学网站面前并无议价权，甚至要受制式合同的控制。在作为版权使用方的影视、动漫、游戏公司面前，网络作家甚至会被排除在谈判与签约之外，由网络平台直接对接版权使用方签约，这易导致作家权益受损。

3. 劳动保障不完善，劳动强度大

网络作家分专职和非专职两种。专职作家通常为自由撰稿人，他们与平台方只是甲乙双方关系，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平台稿酬，酬劳高低取决于作品点击率、收藏数、平台“月票”奖励等，这就要求网络作家必须保证一定日更量，不能随意断更，否则会失去平台奖励和粉丝收入。普遍的一日双更、三更，甚至“日更一万”，导致专职网络作家劳动强度大，作息不规律。

4. 缺乏个人发展的通道与路径

网络作家群体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帕累托法则效应明显。对于头部网络作家而言，其上升通道较为通畅，特别是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文艺群体的身份下，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帮助，部分作家实现了融入社会、参政议政。但是，他们依然面临着职称评定方面的困难。例如，一些创作多年，有较大影响力的头部作家，在评定职称时依然需要从头开始，破格评定难度大。对于腰部网络作家而言，其上升通道主要依靠网站的推荐来实现：一是通过网站平台进行申报，获得文学界相关奖项；二是通过网站平台进行版权经济活动，获得 IP 改编的机遇。这些都要借助

平台的力量来进行，个人很难实现突破和飞跃。对于底层网络作家来说，他们主要是通过海量创作，在市场上赚取点击量和订阅量，无暇规划个人的创作生涯。

课题组调查发现，南京网络作家大多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见图5），但大部分人缺乏个人发展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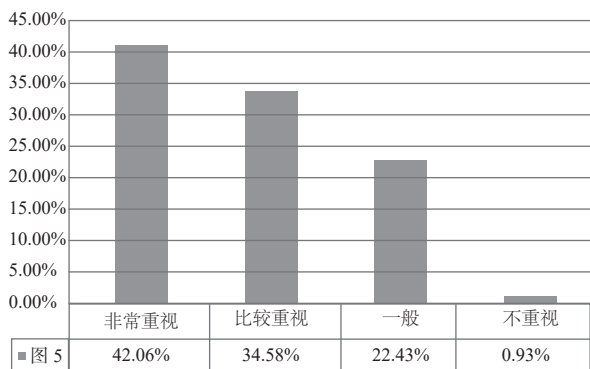


图5 南京网络作家对未来规划和个人晋升的关注度

二、网络作家统战工作面临的问题

作为一个新兴群体，网络作家已成为影响社会思潮以及大众价值追求的一股重要力量，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由于网络作家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部分网络作家的价值追求出现偏差，缺乏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互联网领域的重视，网络文学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化。“网络作家的责任意识在显著增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明显具有低俗、反动色彩的网络小说大幅减少。”^[4]但是，仍然有部分网络作家的创作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存在偏差。例如，具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色彩的网络文学作品依然不少，娱乐至上、内容低俗、价值观扭曲等倾向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Z世代”作者参与网络文学创作，他们往往生活阅历不足，缺乏对社会、对时代的深刻认识与关怀，较少创作反映

时代风云、描写现实生活、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同时，大多数网络作家主要通过虚拟身份及虚拟形象与外界进行联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有的网络作家一味迎合读者的娱乐和消遣心态，无视社会、伦理、道德等社会现实，缺乏对文学理想的坚守和对文学精神的担当。”^[5]

（二）人员构成复杂，不易掌握群体的基本情况

网络作家这一群体构成较为复杂。《2019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在国内77万签约作者中，兼职作者占比达60%；中国作家网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网络文学的创作队伍，不仅来自一二线大城市，也有来自祖国最东、最南、最西、最北的省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创作辐射区。同时，大多数网络作家往往会在现实生活中隐藏自己网络作家的身份，这难以依靠传统方式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地区内的网络作家基本情况。

（三）组织化程度较低，线下沟通不畅

近年来，随着网络文学行业的规范化，网络作家群体组织逐渐形成。2015年，网络作家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之后，全国各地都陆续成立了网络文学组织。《2019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全国共有各级网络文学组织115个，全国各省市除新疆、西藏外，都有了省级网络文学组织。

这些网络文学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网络作家群体一盘散沙的局面。然而，相对于庞大复杂的网络作家群体来说，这种组织化程度还不够，组织功能也未能完善。另一方面，网络作家中的大多数人为“宅男宅女”，很少与外界联系。即使已经有了相应的组织平台，不少人也几乎没有时间或者不愿意参加组织举办的各种活动。例如，本次调查发现，南京网络作家的现实社交能力相对较弱，他们在微信群等线上平台能够积极讨论，但较少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线下活动（见图6）。这导致相关部门与网络作家的线下沟通较

难开展，针对他们开展的教育培训难以做到全覆盖，对他们的引导与管理也较难取得实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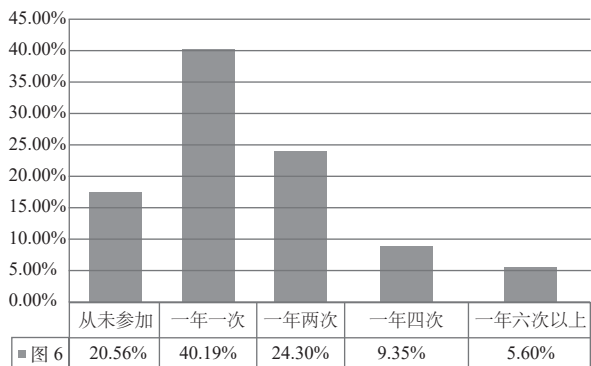


图 6 南京网络作家参与线下社会活动的情况

三、网络作家统战工作的对策

(一) 推进网络作家线下实体化组织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组织起来”的要求，针对网络作家群体个体需求差异大，个人执业完成度高，工作网络化、原子化等特点，积极推进作家村等线下实体化组织建设。不断创新统战工作方式和方法，既要“键对键”，又要“面对面”，加快打造作家村、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等线下实体化组织。由此推动网络作家个体专业优势向组织优势、产业优势转换；同时，为做好网络作家统战工作提供完善的“组织起来”的载体。

(二) 抓住“关键少数”，培养代表人士队伍

在网络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个人大多是分散在各个领域的“小众代表”，缺少思想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创作层次高、社会影响大的领军人物。统战工作要通过在网络作家中先抓住“关键少数”，再扩大工作覆盖面的途径，培养出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受众欢迎且有服务志愿的网络作家代表人士队伍。在此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网络作家人才数据库，以阅文集团、中文在线、百度文学、阿里文学、掌阅科技等各大文学平台的注册作家为突破口，对重点作家进行识别和动态实时追踪，为抓住“关键少数”、培养代表人士队伍提供支撑。

(三) 加强思想引导，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一是打造网络课堂，加强正向宣传引导。网络作家群体的背景相对复杂，个体参与创作的门槛较低，部分作家未接受过良好的学历教育，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系统的认识。同时，网络作家具有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双重身份，多为“宅男宅女”，工作方式具有网络化特点。对此，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加强线上互动，通过统战工作网络化的方式，打造网络课堂，不断加强正向宣传引导，使网络作家能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二是引导网络作家自觉培育、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作家与粉丝全程互动频繁，能够在精神层面引导人、塑造人，特别是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影响较大。对此，应引导网络作家自觉培育、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他们的政治共识，保证其创作方向与社会主义创作方向相符。要引导网络作家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作品，积极讴歌党、讴歌国家、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创作出反映现实、具有主旋律的精品力作。

(四) 切实照顾利益，解决网络作家职业发展问题

网络作家兼职居多，个人身份和行为方式具有隐蔽性的特征。对此，统战部门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线下调查、组织活动的方式，要有针对性地与网络作家建立线上联系，畅通联系渠道，积极了解他们的诉求，充分掌握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理动态，关心他们的生存状态，通过多部门联动，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在此过程中，需特别关注低收入及无收入作家群体，建立健全物质帮扶和精神抚慰机制。

(五) 推进网络立法，维护网络作家合法权益

依法维护网络作家的合法权益，对随意篡改、抄袭的侵权行为坚决抵制，对盗版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网络作家遭遇网络侵权时，面临举证困难、

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对此，统战部门应积极为网络作家提供权益保护普及讲座和免费法律咨询，并协调相关部门或机构推动完善有关网络著作权的法律。

（六）增强服务，管导结合

网络作家活跃于虚拟空间，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独特。对此，统战工作应增强服务，管导结合，柔性治理。这需要及时、全面、准确掌握地区内网络作家的基本情况，不断搭建工作平台，开展联谊交友。可通过创立活动品牌、举办有社会辐射效应的活动，增进与网络作家的感情。同时，加强各类培训，政治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双管齐下，不断挖掘网络作家的个人潜能，帮助他们成就事业。

（七）引导网络作家讲好中国故事

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在海外网民中的一张文化名片。网络作家作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网络平台上有一定的思想影响力。统战工作要充分发挥网络作家的专业优势，使他们在弘扬主旋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发挥正能量。要

充分利用网络文学海外传播优势，让他们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文化输出的国际品牌、宣传中国形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26.
-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 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 [3] 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白皮书[EB/OL].(2021-04-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8096095379731492&wfr=spider&for=pc>.
- [4] 翟中杰. 新时代网络作家统战工作研究[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2): 33.
- [5] 刘陶林, 李江全, 张灿. 网络作家群体统战工作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4): 25.

责任编辑: 吉强

共同富裕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助力 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

——以浙江省为例

张佳慧

摘要: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高度契合,二者的协同发展是助推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是新形势下巩固拓展基层大统战格局的落地之策,而实现共同富裕为加强和改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工作主题和重点,也为新乡贤统战作用的发挥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和空间。作为新乡贤统战模式的发源地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先行地,浙江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巧妙利用地方资源,进行了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有益实践探索,为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巩固共同富裕统一战线提供浙江经验和样本。在共同富裕这一全新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未来应从坚持党的领导、创新平台载体、建立长效机制、注重文化引领四个方面入手,探索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促进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合力推进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

关键词:新乡贤统战;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共同富裕;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24-07

目前,学界对新乡贤与统战、统一战线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讨论较多,而对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缺乏,分析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关系的理论框架尚未建立,对于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融入新乡贤统战力量、发挥新乡贤统战优势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以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作为逻辑起点,探讨在共同富裕背景下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相

融合的理论与实践,从而促进新乡贤统战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有机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使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推进创新,并为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巩固共同富裕统一战线提供区域理论研究参考与实践探索借鉴。

一、共同富裕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

2016年,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率先提出“新

收稿日期:2022-04-05

作者简介:张佳慧,浙江红船干部学院、中共嘉兴市委党校文化与社会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政府治理创新等。

乡贤统战”概念。新乡贤统战是基层党委和统战部门基于中央对新乡贤文化、社会治理以及协商民主的重视，以空间维度、地域文化、乡情纽带为基本途径的全新统战工作模式^[1]。新乡贤统战是基层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创新实践与创新开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文化性特征。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器作用。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高度契合，是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共同富裕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契合性

新乡贤统战与基层社会治理相辅相成，基层社会治理能够推动新乡贤统战工作的发展，新乡贤统战工作也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二者在目标、方式、主体上存在高度契合性。

从目标上来看，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达成社会“善治”，即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善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佳形态^[2]。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基层治理模式而达到“善治”最佳形态。而新乡贤统战也是通过发挥自身在民主协商、参政议政、乡村治理、乡风引领、脱贫致富等方面的作用，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同时，新乡贤统战还能为“善治”这一理想基层社会治理状态的实现提供人脉、智力、资金、技术等资源优势。

从方式上来看，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三治融合”确定为城乡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要求，“三治融合”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作为基层统战与基层治理的新兴力量，新乡贤是基层自治的协作者、基层法治的推动者、基层德治的实践者，新乡贤统战以自治立基、法治引领、德治涵养的方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耦合，并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崭新的统战工作模式^[3]。

从主体上来看，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要求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有效地沟通、参与、合作，其中也包括新乡贤在内的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并强调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而新乡贤统战也需要把各方力量与智慧凝聚起来，将党外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社会贤达人士、民间精英等各类新乡贤群体有效组织起来，激发各界人士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壮大基层统战工作队伍，构建基层大统战工作格局，注重汇聚人才、凝聚人心。同时，新乡贤统战自身也为基层社会治理嵌入了新的主体、注入了新的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实现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最优化。

（二）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优势

新乡贤统战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崭新的统战工作模式，并呈现出强烈的治理导向、体现出浓厚的治理色彩。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治理成本低、治理效能高、社会更和谐的特殊优势。

一是治理成本低。作为联结国家、政党与社会的纽带，新乡贤统战已成为构建基层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环节^[4]。新乡贤统战致力于协调基层社会各方关系，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源支持，集聚基层社会中积极向上的力量，运用汇聚的力量和资源，以新乡贤统战壮大基层社会治理力量，达成对基层社会整体性利益的共识，不断激发基层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基层社会参与主体的协同性、多元性，并将新乡贤这一新的主体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最大化地发挥新乡贤天然的地缘、人缘、亲缘及熟悉当地乡规民约、社情民意的优势，减少碎片化成本投入，降低基层社会治理成本。

二是治理效能高。作为一种新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共同体,新乡贤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文化是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变量,也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力量,而新乡贤文化既是统战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乡贤统战工作的精神动力,统一战线引导新乡贤这一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色彩,新乡贤文化作为新乡贤统战发挥作用的柔性治理优势,能够与技术、制度、法律等刚性治理方式相补充,促进“柔治理”“软约束”,提升治理效能。

三是社会更和谐。新乡贤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在传播乡风文明、宣扬道德风尚、完善村规民约、收集社情民意、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序良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新乡贤具有推动基层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和道德文化力量,通过发挥其言传身教、示范引领、道德教化作用,壮大“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强大新乡贤力量,建立良性平衡的社会秩序,营造和谐有序的基层善治格局,以群贤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共同富裕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浙江实践

浙江各地将新乡贤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充分结合,依托新乡贤统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治理成本低、治理效能高、社会更和谐的独特优势,以平台为支撑、以品牌为抓手、以文化为载体,助力新乡贤统战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走出新乡贤统战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富新路。

(一) 以品牌为抓手

打造新乡贤统战特色品牌,既能充分调动新乡贤的积极性,又能明确界定新乡贤统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使新乡贤统战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中。嘉兴桐乡通过打响“桐贤同行”基层统战品牌,将新乡贤工作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工作相结合,实施“新乡贤+三治融合”工程,

加强对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探索“乡贤+资政参事”“乡贤+矛盾化解”“乡贤+公益助善”“乡贤+乡风引领”为代表的桐乡“乡贤+”治理模式,助力新乡贤当好社情民意代言人、矛盾纠纷调解者、协商民主建设者、法治思想传播者、社会风尚领航人角色,探索出桐乡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途径。嘉兴平湖发挥基层统一战线优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乡情乡愁为纽带,以同心共富服务团为载体,以基层社会治理为着力点,打造“和合报本”新乡贤统战品牌及“丁秋梅乡贤工作室”“李云观调解工作室”“龙乡老娘舅”等多元化新乡贤品牌,创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贤参事会+网格化”的新乡贤参治模式,积极发挥本土新乡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思想库、人才库、智囊团作用,使新乡贤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力量。

(二) 以平台为支撑

搭建新乡贤参与基层共建共治的平台,充分体现互动协商民主的治理内涵,而开展新乡贤统战工作有利于引入外部资源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5]。台州市立足大统战思维,探索新乡贤助力风险防控新模式,建立新乡贤联系县乡村(社区)制度,坚持“三建同步”“三化联动”“三治融合”原则,以新乡贤“和合”调解服务团为依托、以新乡贤调解室为阵地,推动新乡贤助力风险防控由单兵向团队、分散向集成、被动向主动转变,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普法政策宣传、矛盾纠纷调解、社情民意收集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激活基层“和合善治”内动力,拓宽基层“和合善治”新渠道,打通基层“和合善治”全链条,打造基层“和合善治同心圆”。嘉兴嘉善县建立新乡贤阵地,形成覆盖全域的乡愁记忆阵地群,打造新乡贤展示平台。同时,构建新乡贤网格治理平台,形成了在外新乡贤智慧网格、镇外县内新乡贤联网格、本村新乡贤进网格、全员新乡贤进网格工作格局,设立新乡贤网格长,配置网格核心新乡贤

人员,引导全体新乡贤融入网格,使其在村民议事中主动发声、在志愿服务中贡献力量、在基层治理难题中献计出力、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彰显担当,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台州仙居朱溪镇通过搭建议事平台、成立镇村两级新乡贤助调室和新乡贤助调委员会,发动新乡贤扮演好网格员服务员、组织引导员、法制宣传员、德治辅导员等角色,实现小事不出村、难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引导新乡贤在基层协商民主、基层矛盾化解、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助善等方面贡献统战力量,有效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三) 以文化为载体

文化是形成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载体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新乡贤文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复兴和重构新乡贤文化并鼓励新乡贤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优化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源结构,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6]。中国乡村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的乡贤自治传统及历史,浙江省多地新乡贤工作多注重以文化风、以文聚人,试图以文化统战的方法来促进基层自治、德治。作为“三治融合”的发源地,嘉兴桐乡充分发挥新乡贤文化的引领、示范作用,使其成为基层自治的有效抓手,并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与新乡贤统战工作相结合,积极弘扬新乡贤文化,促进新乡贤统战优势与自治、法治、德治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治理格局,凸显了新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成效。温州泰顺县委统战部以“孝慈文化”“仁爱文化”“民本文化”“耕读文化”等新乡贤文化为抓手,借助新乡贤的威望高、人脉广、协调能力强等优势,成立以新乡贤为组员的基层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为推动社会和谐稳定贡献新乡贤力量,为共同富裕保驾护航。嘉兴海宁以海宁入选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试点为契机,鼓励新乡贤通过“红色文化+”“乡情联谊+”“公

益慈善+”等方式参与治理,以项目化方式推动“潮乡聚贤·示范领贤”新乡贤工作规范化,构建起“党建引领、乡贤带头、协同善治”的新型治理体系。

三、共同富裕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浙江各地在探索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巧妙利用当地资源,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各有千秋,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基层治理成效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新乡贤统战的领导格局、组织架构有待完善,新乡贤统战的长效机制、激励机制有待健全,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载体不多、活力激发不足,如何更好地发挥新乡贤统战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依然在摸索中。

(一) 坚持党的领导,形成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双向互动

实现共同富裕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工作方向,推进共同富裕是当前开展新乡贤统战工作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共识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7]。在共同富裕这一全新的背景下,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增强党委领导的基层大统战格局意识,建立统一的领导组织体制,搭建起党委领导、统战部牵头、多部门协作的组织架构,为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让党的领导全过程、全方位地贯穿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中。

另一方面,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全面性系统性工作,也是一项地域性创造性工作,各地在探索创新中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较大空间,地方创新是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因此,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同等重要,既要注重顶层设计,

也要充分调动基层的主动性、创造性，注重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创新相结合。在省级统战部门确定的基本原则、组织构架、工作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地方资源和地方治理的差异化问题，立足本地实际，有侧重、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地开展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多样化实践探索。要尊重基层首创，注重多元化与个性化相结合，鼓励地方在探索过程中做兼容性地方创新与先行先试，并及时将地方有代表性、有影响力、有参考性的创新经验进行推广、移植，形成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双向互动、双向赋能，推动新乡贤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机衔接、良性互动。

（二）创新平台载体，构建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新格局

以新乡贤统战工作为抓手，搭建新乡贤统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平台和载体，以平台和载体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与活力，把平台和载体建设作为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使新乡贤参治有阵地、发挥作用有平台、助推共富有舞台，构建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一是搭建新乡贤组织平台。在新乡贤统战工作载体上，要建立县—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新乡贤联谊组织，健全新乡贤联谊组织运行机制，形成三级联动的新乡贤统战工作网络。新乡贤联谊组织是国家、政党、社会联系新乡贤的重要桥梁和主要纽带，是县级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是乡级整合基层所有统战对象的平台载体。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各项事务，成立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组、矛盾纠纷调解组、建言献策参谋组、协商民主议事组、乡风文明督导组、共同富裕领跑组等新乡贤组织分支机构，并加强各镇与村之间的新乡贤联谊组织及各分支组织的交流互动。同时，培育扶持更多兼具综合性、地域性、公益性、文化性、互助性、服务性的新乡贤组织，他们可以是本土新乡贤参事会，也可以是返土新乡贤工

作联络组，还可以是居城新乡贤理事会。创建吸引力强、参与度高的新乡贤统战治理组织体系，调动统一战线广泛组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把复杂多元的新乡贤作为统战资源有效组织起来，以新乡贤统战壮大基层社会治理力量，解决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资源分散、活力不足等问题，通过各种组织形式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形成多元共建共治合力，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路径，推动新乡贤组织助跑共富路。

二是搭建基层协商民主平台。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要积极搭建协商民主平台，借助协商式治理方式、制度化协调对话机制，围绕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需求开展专项调研、座谈等协商活动，为基层社会治理出实招、谋良策，及时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同时，发挥新乡贤统战在畅通表达渠道、实现民意聚合及推进基层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最大限度激发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构建起新乡贤共治、全社会协同的共建共享新模式，努力把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的协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是搭建项目化基层参治平台。项目建设是新乡贤统战的主要载体，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项目制也已成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8]。要注重发挥“三治融合”发源地优势，突出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实施“四治融合”项目提升工程，创新“一约两会三团四智”（即村规民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议团、智安建设、智助服务、智慧治理、智辅防疫）载体，构建以“一约两会三团四智”为主要载体的“四治融合”基本架构，开展“四治融合+”系列创建，拓展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同时，项目化发布“微治理”“微心愿”，完善项目认领机制，鼓励新乡贤认领实施，搭建项目化基层参治平台，以项目化方式创新工作载体、加强成员联动，破解基层社会治理新题、难题，推动以点带面、整体突破。

四是创设“互联网+参治”平台。聚焦基层“微”治理,将新乡贤统战力量充分嵌入新时代“网格连心、组团服务”中,以“新乡贤+网格化”善治模式来化解基层矛盾、解决民情诉求、助力风险防控、开展精准服务,织密新乡贤“微网格”参治网,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有效助推共同富裕。结合数字化沟通方式,创设新乡贤统战“互联网+参治”平台,通过新乡贤QQ群、微信群、微博互动群组等线上沟通方式,密切与新乡贤的在线沟通交流,建立新乡贤在线调解“云平台”,畅通新乡贤为基层社会治理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的在线参治渠道,发挥新乡贤在网络社会中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参与网络舆论治理、传播正能量的作用,并提升新乡贤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营造积极向善的基层社会治理舆论环境,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网络的延伸。

(三)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新乡贤统战工作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新乡贤组织规范化、常态化运行工作机制。完善新乡贤组织的日常管理制度和工作规则,确保新乡贤组织良性运行。形成规范完整的新乡贤评选管理办法,形成清晰的新乡贤统战工作主线,增强新乡贤统战的合法性、合理性,并依托新乡贤特殊优势,组织新乡贤积极参与法律宣传、纠纷调解、治安防范、治水拆违、志愿服务、美丽乡村建设等常规性活动,使新乡贤成为调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带领村民致富的重要力量,持续释放新乡贤统战共富活力因子。

二是建立健全新乡贤沟通联谊机制。联谊交友一直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方式,做好新乡贤统战工作也需要广泛的联络交友和真诚的沟通交流,与新乡贤广交、深交朋友,经常同他们开展座谈交流,沟通谈心,为新乡贤统战人士提供有温度的基层参治阵地和服务平台。建立起全覆盖的党政领导同新乡贤代表人士的联系走访机制和

联谊交往机制,完善新乡贤动态信息库,定期开展同乡会、团拜会等各种新乡贤交流联谊活动,在联谊交流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向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引导他们自觉拥护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寓思想政治工作于交友联谊之中,并在联谊交往中厚植乡情,在联谊活动中实现情感认同、关系认同。

三是建立健全新乡贤参治保障机制。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人脉优势使新乡贤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参与和各项社会事务管理的热情逐渐高涨,要保障新乡贤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推动新乡贤代表人士共同参与村规民约的制定与完善,通过会议参事、活动参事等形式,实行新乡贤定期参与本地中心工作的重要会议、重大发展项目讨论及统一战线重大活动制度、各项民主决策制度,广泛充分地征求新乡贤意见、凝聚新乡贤智慧,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

四是建立健全综合激励机制。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用发挥明显、助推共同富裕成效显著的新乡贤授予荣誉表彰,还可给予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安排,如将优秀新乡贤推荐为“两代表一委员”候选人,邀请新乡贤列席本地党代会、人代会、政协等重要会议,鼓励优秀新乡贤参与村级后备干部竞选,进入党委、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参加党委、政府组织的各类培训活动等,激发新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以此培养和带动更多有才识、有情怀、甘奉献的新乡贤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助推共同富裕。

(四)注重文化引领,为共同富裕凝聚善治共识

一是把新乡贤文化作为塑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新乡贤文化既是统战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乡贤统战工作的精神动力,也是顺利推进新乡贤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社会治理不仅仅涉及技术性操作,更是以一种共同文化价值观为基础,不断传递共同理想信念,从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9]。在新乡

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把新乡贤文化作为塑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打造面向共同富裕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时,将新乡贤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共同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以新乡贤文化激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在实现物质富裕的同时实现精神富足。

二是充分发挥新乡贤统战的道德激励作用。作为基层统战工作的创新模式,新乡贤统战这种模式的传统文化根源主要是中国传统的乡土观念及道德感化。一方面,新乡贤联谊组织能对新乡贤在道德教化上产生引领、示范作用,促使他们在道德上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弘扬新乡贤善治精神,塑造其成为道德榜样,激励新乡贤向榜样学习和靠拢,带动更多新乡贤自觉参与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工作,提高他们参与共建共治的主动意识,激发他们推进共同富裕的最大内生动能。另一方面,新乡贤统战的工作任务包含宣讲道德伦理、弘扬道德风尚、树立社会公德、提升文明风气,通过发挥新乡贤在法治保障、德治教化中的传帮带作用,把提升村民法治素养的基本要求融入乡规民约,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和谐有序的发展环境,以新乡贤统战引领基层善治、推动法治、引导德治,提升新乡贤统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三是营造敬贤倡贤颂贤的浓厚文化氛围。建设有地方特色、人文特色、统战特色的新乡贤馆、新乡贤榜、新乡贤墙、新乡贤文化礼堂、新乡贤文化教育基地等线下新乡贤文化阵地,培育新乡贤统战工作示范点,挖掘本地新乡贤文化的深厚

内涵,促进精神富足和文化富有。同时,依托各大门户网站、官方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线上阵地,通过多元化立体化宣传方式,报道新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典型事迹,讲好新乡贤助力共同富裕的生动故事,开展“模范新乡贤”“最美新乡贤”等评选活动,将新乡贤的参治成效作为评选的重要依据和标准,让优秀新乡贤发声亮相,增强新乡贤参治的自我价值感与社会认同感,营造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择善而从”及敬贤、倡贤、颂贤的浓厚文化氛围,以新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动能,着力打造以新乡贤文化推动共同富裕、凝心聚力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生动格局。

参考文献:

- [1][3] 许军. 新乡贤统战: 基层统战工作的整合拓展与全新模式——以浙江省县以下实践为案例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4): 77、81.
- [2]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8.
- [4][9] 刘静, 刘嘉祺. 统一战线发挥情感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 [J]. 新视野, 2021(6): 58、57.
- [5][8] 李传喜, 张红阳. 治理型统战: 新乡贤统战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发展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4): 94、96.
- [6] 白现军, 张长立. 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11): 82.
- [7]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N]. 浙江日报, 2021-05-20(1).

责任编辑: 鲍跃华

新形势下开展海外统战工作初探

——以南京为例

郭霖

摘要:做好新形势下南京海外统战工作,要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下,总结南京海外统战工作的经验成绩,摸清南京海外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统筹“五侨”、用好平台、开发资源、提升效率,做到虚实结合、刚柔结合、内外结合、官民结合,用扎实有效的统战工作,提高海外侨胞对祖(籍)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扩大反“独”促统统一战线,引导海外侨胞积极参与南京“创新名城、美丽古都”建设,使南京海外统战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关键词:新形势;海外统战;侨胞;江苏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31-08

海外统战工作,广义地说,是指做好海外侨胞和出国留学人员的工作、民族宗教对外交往工作和海外涉港澳台、涉疆、涉藏等方面统战工作。本文所指海外统战工作,特指面向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国内归侨侨眷的工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和团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国际形势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局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增进海外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外交流合作、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吸引海外人才投身国内经济建设、反“独”促统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

量。新形势下的海外统战工作,需要采用新思想、新方法,探索新模式、新手段,以适应新形势,提高工作成效。

一、中国共产党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1]

(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海外统战工作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和团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作

收稿日期:2022-06-02

作者简介:郭霖,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

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20世纪30年代,为了建立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国内外一切力量进行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制定对海外华侨华人工作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回国等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定,加强与华侨所在国的沟通,以及与华侨华人的联系,切实保障海外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权益。周恩来也多次思考并公开提出,“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2]。在新的历史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内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组成的、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另一个是大陆范围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团结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这就改变了过去统战工作主要在大陆范围内做工作的旧格局,形成“立足大陆、三个面向”开放型的新格局。

(二) 做好海外统战工作是深入贯彻大统战思维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了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伟大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无小事”“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是大统战思维的核心内容,也是对当前海外统战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新形势下做好海外统战工作,必须善于站在政治和全局高度来研判形势、把握大势,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进一步做好海外统战工作。

(三) 做好海外统战工作有利于继续发挥侨界力量

据国侨办最新统计,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

总数已达6214万,分布在198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约400万,华侨华人资本约4万亿美元。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投资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70%。目前,回国创新创业、发展事业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约40万,创办企业约3万家。做好海外统战工作,鼓励和支持侨界人士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可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引导华侨华人社团加强团结与合作,可以推动全球反“独”促统运动,形成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局面;发挥侨界人士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可以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促进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可以继续推动侨界人士参与当前经济、社会建设。总之,做好海外统战工作可以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二、海外统战工作的现状——以南京为例

南京是一个与海外侨胞联系十分密切的城市。南京市涉侨人口总量约34万人,超过全市总人口的4%。其中,华侨华人各约1.8万人,归侨约1000人,侨眷约28.3万人,留学归国人员约3.8万人。据不完全统计,约60%的南京外资企业、80%的省“双创计划”人才、50%的市“321计划”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都具有“侨”的身份。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南京出国留学、经商、定居的人逐渐增多,是新形势下海外统战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侨特点鲜明。一是国内居住地相对集中。新侨在南京的居住地主要集中在城区,62%的新侨主要居住在六城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大国家级开发区和中国(南京)软件谷对新侨流入的拉动效应。二是整体比较年轻。新侨中50岁以下的占78.5%,其中40岁以下的占30.4%。三是文化素质高。新侨大部分有海外留学、工作经历,受教育程度高,拥有学士及学士以上学位的占84.9%,其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的占45.9%，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群体。四是国外背景相对集中。新侨80%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其中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占51.1%。五是创业领域相对集中。新侨回国后多集中于科技研发、新兴产业领域，有的在跨国公司驻南京机构担任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与海外社会和高技术专业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形势下南京海外统战工作的现状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实施机构改革，推动涉侨行政

一是实施了市侨办整体并入市委统战部的机构改革，明确了处室职能。二是依法维护侨益，办理华侨回国来江苏定居审批、归侨侨眷身份认定、“三侨考生”身份认定等行政事项，做好涉侨解困、涉侨信访工作。三是发挥“五侨”联动平台——市人大民宗侨外委、市委统战部（侨办）、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市侨联、致公党南京市委会五家涉及侨务工作的单位的协同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侨务工作。

（二）保护华侨权益，立法执法并重

一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江苏省保护和促进华侨投资条例》《南京市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办法》《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等，积极回应宁侨胞的诉求，切实维护侨胞的合法权益。二是对华侨权益保护条例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通过常委会执法检查推动了涉侨法规政策的普法宣传，同时也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南京市金融办与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沟通协调，确保华侨可凭护照或暂居证到银行开户，解决了华侨“银行开户难”的问题。

（三）围绕中心大局，抓好引智引资

一是邀请海外客商参加“江苏发展大会”和南京市“招商突破年”“创新周”“金洽会”等重大经贸活动。二是推动“侨梦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2019年，“侨梦苑”共引进25家涉侨企业，入驻涉侨企业总数达到225家。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华商组织协作网络，及时

发布经贸合作、政策解读等信息，引导华商和华商组织参与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商贸物流和产业园区建设。

（四）服务侨资侨企，拓展侨务资源

一是密切与发改、科技、工信、金融、人才办等职能部门的合作，了解涉侨企业可以参与的专项活动、各类补贴和扶持政策。二是加强日常走访，推动企业与“侨梦苑”园区有效对接。三是重点打造“筑梦金陵”涉侨企业服务品牌，实现统战联动、园区企业联动、政策项目联动。四是制定《关于进一步发挥华侨华人在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重要枢纽城市建设中作用的实施意见》，把发挥侨资侨企作用，作为统一战线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着力点。五是推进“侨务进三区”（社区、园区、校区），梳理涉侨数据信息，完善涉侨数据库，拓展侨务资源。

（五）聚焦文化交流，做好侨务外宣

一是聚焦重大活动，打造文化品牌。南京市统战部侨务文教事务处组织实施“中澳教育文化交流暨孟非奖学金基金发布仪式”专场活动，筹划“古镇之约”“海丝新语·文化传情”南京与“一带一路”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实施“2019海外华裔菁英青少年大运河文化体验活动”，使文化交流常态化、品牌化。二是做好侨务外宣。设计制作侨务工作宣传片；在美国《侨报》、俄罗斯《龙报》、法国《欧洲时报》、澳大利亚《大洋日报》等华文媒体上刊发了5个海外专版，对南京进行宣传报道，进一步提升南京的国际形象和知名度；配合世界知名城市“南京周”活动，协助联系美国华人专家会、北加州江苏同乡会、全美中华青年联合会、美国《国际日报》《侨报》等美国华侨华人社团和机构做好对接交流和新闻报道。三是选拔华文教育工作者赴海外开展华文教育工作，筹备“一带一路”华文教师培训班。四是牵头建立海外华侨华人及留学人员抗击疫情宣传工作机制，做好抗击疫情专项宣传工作。五是分析海外华媒对南京的报道，找出其关注度和内在联系，

探索深入开展华媒宣传的新途径、新方法。

（六）积极联络侨领，指导民间协会

一是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加强与海外特邀代表人士的联系，积极开展涉侨界别委员活动，邀请部分特邀代表人士参加了“江苏发展大会”“南京创新周”“金洽会”等大型活动。二是发挥海外侨领的带头作用，在特邀代表人士群里号召大家团结奋战抗击疫情。来自日本、加拿大的张滨、沈亮分别组织筹划了所在城市的捐款、捐物工作。三是指导侨商会开展工作，发挥侨商会桥梁纽带作用，定期走访、及时沟通，协助秘书处做好日常事务、重要活动的组织协调；协助南京市海外交流协会与南京海外联谊会合并。

（七）拓展海外联谊，广交深交朋友

南京市侨联、金陵友协、南京公共外交协会等社会团体在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下，立足侨海特色，发挥侨海优势，搭建桥梁、共享资源，以血缘、地缘、语缘为基础，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了大量的基础性、创新性的海外统战工作。

一是重点打造文化、经贸交流品牌，如市侨联举办“亲情中华·锦绣金陵”文化交流活动、“亲情中华·相聚南京”经贸交流活动。二是重点打造针对新侨、海外留学生的活动，如市侨联的“寻根之旅”华裔青少年夏令营、冬令营活动，“追梦中华·好 YOUNG 江苏”海外留学生看南京活动等。三是南京公共外交协会广泛吸纳侨界精英，发挥国内外联络的渠道优势，积极参与南京城市形象推介，举办“梧桐奖”评选以激励更多各界人士和社会团体关注、支持、参与公共外交事业，牵线海外人才项目对接，每年热情接待数十批包括美国飞虎队研究院参访团、中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等在内的各界海外及涉外来宾。

（八）搭建平台载体，引进来、走出去

一是市侨联搭建多维平台载体。与“美中交流协会”建设服务海内外侨胞的驿站；与江苏省广播电台合作开展“我讲给你听”活动，利用中

国传统节日，邀请海外和国内嘉宾共同讲述节日故事；建设“华侨文化交流基地”，组织海外侨领和侨胞来南京华侨文化交流基地参观；审批审定 18 家“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更好地为侨企服务；与此同时把南京的宣传材料向海外侨团推送。二是致公党南京市委组织海外博士及高层次人才赴江苏各地考察创新环境，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科技园区对接洽谈。三是致公党南京市委开展“文化丝路行”活动，以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为媒介，增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认同，两年来已吸引了“一带一路”沿线 35 个国家及地区的 50 多所院校参加。

（九）建设和谐侨社，组织抗疫援助

一是市侨联注重遴选侨领，建设和谐侨社。市侨联与海外 60 多个侨团和 1260 多个侨胞有着经常性的联系，他们在选择侨领时注重选择政治上可靠、经济实力较强、在侨胞中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经常在海内外组织开展交流和参访活动，及时发送侨联开展工作的情况，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和支持海外侨团之间加强沟通和合作。二是积极组织抗疫援助。当海外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时，致公党南京市委、金陵国际友好协会等单位通过跟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人员进行网络沟通的方式向广大海外侨社及留学人员表达了关心和慰问，并捐赠大量善款和抗疫物资，让海外侨胞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真情。

三、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认识层面的问题

一是对新时代海外统战工作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侨务工作顶层设计还需完善。新时代海外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特别是职责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要从海外统战工作的全局高度进行统筹谋划，深入研究、主动探索，从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推进海外统战工作。二是工作理念还不够新。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不仅需要继续传承传统工作经验，而且需要创新工作理念、思路、内容、方法，推动侨

务工作由事务型向服务型转变。

（二）政策法规层面的问题

当前涉侨法律法规、政策在实施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涉侨人员的身份认定比较模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中对华侨侨眷的身份进行了界定，此后又做了一些补充说明，但始终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二是华侨凭护照处理部分民商事务时有困难。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中有相关规定，但执行起来还存在困难。三是华侨投资企业难以界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未对侨资企业做出明确界定，《江苏省保护和促进华侨投资条例》规定华侨投资者及其设立的企业依法享受各项税收优惠，但实际上并没有专门针对华侨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四是涉侨人员的某些诉求与法律法规及政策不符，华侨华人的相关权利保护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五是引才政策精准性不高，政策认知度有限。引才政策与地方经济、科研特色适配度不够，规模性引才政策普惠度较差，侨务政策法规在社会上影响有限，群众的认知度不高。

（三）操作层面的问题

一是对侨情的准确数据掌握不够，侨务资源的开发和运用仍显不足。一些有海外资源的居民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不愿表明自身或亲属的真实情况。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各地不断推出优惠政策，前期对侨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不再具有优势，现有侨资企业对侨务身份的认同感有所淡化，给侨情统计、侨务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带来难度。二是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存在应对慢、措施少，创新工作机制和手段不足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海内外人员交流困难，对外文化交流几乎出现停滞现象，而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开辟新的渠道进行弥补，特别是缺乏针对新生代华侨华人、留学生的创新工作机制。三是涉侨活动品牌还不够响亮。涉侨活动

经典项目数量少，时效性、高端性和稳定性不够。四是政策落地软环境亟待完善。信息不对称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当数量海外学成归国青年人才专业与工作不匹配，影响了他们才智的发挥。五是海外统战工作每年的出访指标计划、项目安排、经费预算受限，赴海外开展联谊交流工作频率不高，与海外工作对象交往不深、了解不透，侨务工作的独特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六是海外统战工作与港澳台统战工作有交集，各部门间职责交叉、方法雷同，信息沟通不够顺畅、资源共享不够充分，工作整体合力有待提升。七是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对涉侨人员权益保护的认识还不到位，对涉侨政策不够熟悉，政府涉侨部门对基层侨务的指导比较欠缺。

四、进一步做好海外统战工作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海外华侨工作，引导和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3]南京海外统战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还应着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在思想认识、工作机制和方法手段方面进行提升和创新。

（一）从思想认识上提升和创新海外统战工作

1. 进一步把握新形势下海外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是明确方向，把握底线。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不断增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祖国认同。二是坚持开放、理解、包容的原则。要用开放的而不是狭隘的眼光分析和处理问题，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要理解和包容文化差异性，讲求工作方式方法的艺术性。

2. 进一步把握新形势下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

一是紧紧抓住争取人心这个根本。应把华侨华人以及归侨侨眷进行细分，精准施策，针对侨领、“侨二代”“侨三代”、留学生等不同人群采取

不同工作方式。二是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纽带作用。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只有保持共同的文化认知、文化联结，才能做到心灵相通、情感交融。三是扎实做好“侨二代”“侨三代”及留学生等青年群体工作，这是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大量留学生回国，这批人相对年轻，居住集中，宜利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网络社交媒体以及社区宣传和他们交流。四是加强海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很多侨领同时身兼工商界领袖，可以和海外商会协同一致，发挥好代表人士的代表作用。五是推动形成全域统战工作格局，全党要把统战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战略高度上去认识，寻求工作最佳切入点、突破点和结合点。

3. 进一步认清海外统战工作的特殊性

面对面沟通不仅可以增强彼此之间的重视感，而且还能通过五官的感觉和肢体语言消除疑虑，增进信任，得到及时准确的反馈。面对面沟通的积极作用和长久的影响力是电话沟通、网络沟通等方式难以做到的，更适合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开展海外统战工作需要走出国门，与侨居在不同国家的工作对象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与他们交朋友。因此，鉴于海外统战工作的特殊性，应当适当放宽每年的出访指标计划、项目安排、经费预算，增加赴海外开展联谊交流工作频率，深层次与海外工作对象交往、联谊。

(二) 从工作机制上提升和创新海外统战工作

1. 统筹“五侨”，放眼全局

一是继续依靠“五侨”联动，进行海外统战工作协调行动。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建立定期会议制度，采用“理、利、文、法、情”五位一体的方法，以达到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二是逐渐形成“五侨+”工作机制，加强“五侨”与文化、招商、科技等部门的协调沟通，加强“五侨”与其他涉侨社会群团的联系，加强“五侨”与园区、校区、社区基层统战群体的交流，以“五侨”为海外统战工作龙

头，带动全市海外统战工作的发展。三是树立全域统战的长远目标，在“五侨”联动的基础上探索全域统战。海内海外、党内党外、体制内外、“圆内”“圆外”、网上网下、上层基层各领域，强调全局眼光、战略思维和系统谋划，建立健全全域、立体的工作体制机制，保证工作格局的形成和工作成效的实现。

2. 优化服务，升级平台

一是升级文化交流平台。为了吸引大量“侨二代”“侨三代”和留学生，我们提供的“文化大餐”应该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有当代文化，重点发掘两者结合的优秀文化项目，如苏州市的双塔市集、沧浪亭沉浸式昆曲等，做好文化统战工作。要与相关部门联合打磨现有对外文化交流品牌，使它们成精品、成系列，成为凝聚人心、凝聚共识的主阵地。要用好南京“文学之都”的城市文化名片，展示“金陵光影”“金陵山色”“金陵水韵”“金陵乡愁”，讲好南京故事。二是升级经贸招商平台。继续优化服务，积极配合重要引智引资活动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密切与发改、科技、工信、金融、人才办等职能部门的合作，了解涉侨企业可以参与的专项活动、各类补贴和扶持政策并有针对性地推送。三是打造学习、培训、宣传平台，持续开展针对侨务工作者和社会大众的统战知识培训、宣传。

3. 用好资源，提高效率

一是进行侨务资源调研，建立海外统战工作成效评估机制。推动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及其他研究单位开展统战理论和实践研究，继续推进“侨务进三区”（社区、园区、校区），搜集侨务人员居住国、来南京投资、旅游国、留学生留学目的地等数据，完善涉侨数据库，精准制定侨务政策，及时对海外统战工作成效进行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存在的不足及时进行整改。二是进行侨务资源整合共享，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避免不同部门因争夺资源导致的效率低下。在侨务机构改革完成后，一些涉侨部门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

个别职能、资源、权限、手段等不匹配的现象，应该进行调整明确。

(三) 从方法手段上提升和创新海外统战工作

1. 虚实结合

一是线上交流与线下交流相结合。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与海外统战对象进行互动交流成为主要工作方式。线上交流具备图像生动、联络快捷、成本低廉、信息便于储存等优势。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面对面沟通有着易于消除疑虑、增进信任、反馈及时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海外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沟通交流手段。二是将看得见的文化交流和看不见的统战工作相结合。一些海外统战对象，包括很多“侨二代”“侨三代”、留学生，对统战理念不理解、不关心，但是对中华文化和当代艺术比较喜爱，因此用文化艺术作为媒介联谊交友，“润物细无声”地实施统战工作，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刚柔结合

一是将完善法律法规（刚）与“目中有人”（柔）相结合。应该尽快完善涉侨法律法规执行细则，切实给侨务工作对象带来实惠。在依法做好海外统战工作的同时，更要注意“目中有人”。对于有资本、有技术、有潜力、有见解、有号召力以及有困难的工作对象，应该以人为本，用细致耐心的人文关怀扩大统战同心圆。二是将经济硬实力（刚）与文化软实力（柔）相结合。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举国抗疫获得成功，强大的祖国激发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但是部分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疑虑也的确存在。所以，既要以祖国强大的经济硬实力吸引人，更要理解、尊重和包容文化差异，利用好文化交流平台，以血缘、地缘、语缘为基础，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进行文化对话，用文化软实力扩大海外统战成效，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3. 内外结合

一是海内海外统战工作协调互动。统筹海内海外的统战资源，协调好海内海外统战工作，既“引进来”也“走出去”，就能产生统战成果叠加效应。要坚持政协海外特邀代表制度，积极开展涉侨界别委员活动，发挥海外侨领的桥梁纽带作用。要认清海外统战工作的特殊性，增加赴海外开展联谊交流工作频率。二是“圆内”“圆外”结合。“圆内”是指已团结的统战成员，要进一步巩固发展；“圆外”是指尚未纳入统一战线同心圆的潜在统战人物，甚至包括部分暂时不赞同我们方针政策的势力和人员等，在坚持政治底线的前提下，也要做好他们的工作，不能轻言放弃。要重点做好侨眷工作，探索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以面带圈，开展以统战人士引领统战对象的工作，塑造全域统战生态。

4. 官民结合

一是加强体制内外、上层基层的海外统战资源协调配合。统战工作部门要和侨联、公共外交协会、各海外商会、中华海外联谊会、基层统战社团等多沟通交流，协同工作。二是加强统战知识的宣传普及。开展统战课程、统战现场教学进党校，继续推进“侨务进三区”，摸清底数、动态掌握侨情，宣传侨务工作亮点。三是重视公共外交在海外统战工作中的特殊作用。公共外交是海外统战工作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建议党委、政府和政协等部门进一步重视、支持和推动公共外交协会的工作，通过开展公共外交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国家形象，实现海外统战与公共外交的“共赢”。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21-07-08).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708/c437911-32152777.html>.
- [2] 董小鹏. 风雨四十年：第一部[M]. 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4：318.

- [3]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EB/OL].(2020-10-16).

http://china.cnr.cn/news/20201016/t20201016_525297644.shtml.

责任编辑：宋好

习近平关于加强我国人民民主建设重要论述的多维探究

言浩杰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人民民主,以及如何建设人民民主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多新观点新论断。发展更加广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信心,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实现。如何建设这样的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了衡量标准,如坚持走与本国实际相符的民主之路,坚持相应的民主评价标准和建设要求,积极吸收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有益的政治发展经验,又结合我国实际指出具体实践路径,如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人民民主制度化法治化,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我国人民民主建设重要论述,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人民民主;目标;价值;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39-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践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理论和实践创新。在这一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探索和研究这些重要论述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进程,不仅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重要指导,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推进民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对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主发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

一、人民民主建设的目标之维

(一)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巨大飞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民民主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由此,广大人民的诉求和意愿得到反映,权利得到实现,权益得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进一步得到彰显,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广泛的民主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

收稿日期:2022-06-01

作者简介:言浩杰,盐城师范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与实践。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国人民民主发展的经验，指出我国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对发展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提出了具体要求。实行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就是要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在各方面能够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一是人民民主内容的丰富性。人民民主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而且要在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与管理等各个方面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二是人民民主权利的多样性。选举和协商、决策与管理、监督与评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这些环节必不可少，少了任何一个环节，民主就不可能健康发展。选举和协商、决策与管理、监督与评价各个环节必须环环相扣，彼此贯通，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各阶层群众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诉求，使民主权利不断扩大。三是人民民主主体的扩大化。人民民主主体扩大化意味着要“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1]。同时，对于社会发展中涌现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以及新社会群体成员，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参与主体。

（二）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可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探索创新民主形式，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自治。在基层治理中，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议事会、恳谈会、洽谈会、网络协商对话等多种形式，实现了群众事群众议、群众事群众办、群众事群众管。在解决基层矛盾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维持了基层的和谐与稳定，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朝着现代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意味着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广大人民群众除了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更高要求以外，在民主、法治等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广大民众对直接参与管理、决策的诉求日益增强。因此，除了保持已有民主的基本形式和优势外，还需要有其他的人民民主实现形式。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2]。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大力推进协商民主，使之实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发展充分的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向。

（三）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初步形成和发展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牢牢掌握自身的命运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推动民主制度发展走向深入。发展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意味着完善人民民主制度，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追求高质量人民民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优势；不断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更好地彰显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好发挥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作用；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好地突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优势。

二、人民民主建设的价值之维

加强人民民主建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具有重要价值。

（一）加强人民民主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许多仁人志士希望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模式来改变落后的旧中国。然而这

些探索却使中国社会进一步陷入泥淖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民主理论，带领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后，更加重视人民民主建设的作用。从“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民主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如今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民主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主要制约因素。”^[4] 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期待和要求之高前所未有。

（二）加强人民民主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是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5]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换句话说，国家制度的供给能力和执行能力愈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亦愈现代化。一方面，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对于构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供给基础。加强人民民主制度建设，有助于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强大的制度供给，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另一方面，更加广泛、

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有利于构筑强大的民主治理能力。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保证下，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下，有效调动和凝聚起各方力量，发挥多元主体的才智作用，促使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强大的民主治理能力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

（三）加强人民民主建设是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信心的必然要求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100年来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辟的道路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中国人民在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探索奋斗的结果。这条道路适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实际。人民民主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最亮丽的底色。我们走的中国式民主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依靠人民民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建设更加广泛、充分、健全的人民民主意味着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得到强化，人民民主文化基础得到夯实，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三、人民民主建设的衡量标准之维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共和国70多年探索建设史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史，其中一大亮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从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人民民主之路。在新时代推进我国人民民主发展道路进程中，我国始终坚持走与本国实际相符的民主之路，坚持相应的民主评价标准和建设要求，同时积极吸收并借鉴国外有益的政治发展经验。

（一）坚持走与本国实际相符的民主之路

走自己的路必须认识到本国的实际情况。通向民主之路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国家有着不一样的实际状况，民主化、现代化道路适合本国才是最好的，一味照搬照抄他国政治发展模式注定

死路一条。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独特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因此国家之间的政治发展道路都不同。事实也证明：推进人民民主发展，从未有任何一套民主模式可以“照着来”。“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样的民主制度可能在西方国家运转得很好，但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也许就运转得不太好。中东北非等地照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结果从“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出现此类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文化的不同。一个好的民主政府，需要依靠政治架构以及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即使他国政治制度再优秀，如果本国政治文化不支持，民主政治的运作就会出问题，在推动民主化道路上取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6]。一国的社会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只有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坚持走与本国实际相符的民主之路，才会不断促进国家平稳运行和发展。

（二）坚持相应的民主评价标准和建设要求

民主的评价标准和建设要求须与客观实际相符，顺应民主发展规律。历史和事实反复证明，没有一种评判标准和建设要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国的民主发展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衡量尺度。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探索，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我国自身发展的体系和模式。在推进我国人民民主发展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完整地提出了衡量标准和建设要求，他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和有效，主要看“八个能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主评价标准和建设要求，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和我国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及其政治优势。这既是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成效，也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具体方向。这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自信，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人民民主建设的路径之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一目标，积极贯彻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采取实施一系列战略举措，形成了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的多元化实践路径。

（一）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民主执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7]历史实践与经验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是否享有民主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试金石。因此，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党的民主执政是加强人民民主建设的必然途径，对于促进我国人民民主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8]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和发扬党内民主。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条重要准则。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坚持民主工作作风，使用民主工作方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发挥党内智慧和力量，把党内形成的民主习惯带到工作岗位，才能带动社会民主风气转变，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促使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获得更多增量。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始终把群众路线贯穿于治国理政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不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亦是恒心。唯有确保党在决策环节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才能不断提升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和水平。

（二）推进人民民主制度化、法治化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法治化是我国人民民主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人民民主不断前行发展，离不开民主制度完善和发展。一旦离开制度谈民主，离开本国实际谈制度建立，建立的制度就得不到完善和发展，人民的权利就要落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无法保障。民主制度建立对于发挥制度的约束力提供了条件，为政治参与共识的达成提供了基础。如果无法遵守经由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以及服从合法权威，民主政治运作就会遇到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9]从制度上推动人民民主的成果落地见效，更好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国家在推进民主制度化法治化的进程中，必须考虑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如果民主制度只关注权力怎么产生，聚焦于选票的数量、竞选的资金等，把广大民众的物质、安全等需求抛诸脑后，那么这种民主制度化只会带来政治的极化、社会的分化。在我国，推进民主制度化就是最大限度找到社会公约数，尊重人民群众的愿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原则，把民主制度化、法治化更好地融入人民民主实践中。

（三）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加强我国人民民主建设，就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扩大广大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一是丰富人民民主发展形式。“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0]，既要通过依法选举的方式，又要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供给，让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既要推进选举民主的发展，同时又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推进协商民主形式发展，确保广大人民群众会协商、善协商，不断促进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协同发展。二是拓宽人民民主发展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中指出，让互联网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11]。除民主监督外，还应不断发展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渠道，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广大民众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身的意愿和诉求。三是培育公民理性参与意识。体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着力培养公民的理性参与意识，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正确的民主理念，积极、正确引导广大民众理性参与政治，以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我国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我国人民民主实践在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成果，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鲜活经验。在推进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来把握中国实践和发展民主的路径与方式，从更为彻底和全面的民主原则出发，创造了民主新形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理论宝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为世界其他国家推进民主发展，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方案。只有推动我国人民民主理论守正创新，既定的人民民主发展目标才会不断实现；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稳；只有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遵循本国自身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努力自主建构符合本国实际的民主，才能夯实本国政治基础，增强发展底气。

参考文献：

-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N]. 人民日报, 2012-11-18(1).
- [2][5][6][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293、289、285-286、286.
-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55.
- [4][7]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1、37.
- [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7-02(2).
- [11] 温红彦, 张毅, 廖文根, 等. 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网络强国战略综述 [N]. 人民日报, 2017-12-02(1).

责任编辑: 鲍跃华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及实现路径

柳兰芳 徐晓晴

摘要:不同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由社会机制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在推动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第三次分配的实现不仅能助推“先富”带动“后富”,而且能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更好地助力精神生活维度的共同富裕。探索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就是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的主要构成及如何激发参与主体的活力。就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而言,党员干部、广大青年学子、高收入群体以及慈善组织是主要构成部分;要激发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的活力,发挥其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问题,也是关乎第三次分配能否实现的一大重点。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参与主体;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45-06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推进,社会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以历史性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对美好生活需求提高到更高层次,我们距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象比较突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群之间收入有所差异。在此背景下,对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第三次分配制度”进行系统解读,并对其在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中的作用及其实

现路径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第三次分配的提出及其解读

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第三次分配”这个概念。厉以宁认为第三次分配就是指人们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1]。简而言之,就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在厉以宁提出这一概念的25年之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第三次分配纳入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并明确指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公益事业。

第三次分配制度一经中央正式文件提出,瞬

收稿日期:2022-05-16

作者简介:柳兰芳,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伦理学;徐晓晴,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市社科规划课题“‘两个大局’视域下天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与势研究”(TJSGZL22-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间引发热议。2021年9月15日,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提出,大陆近期提出共同富裕及三次分配,许多台商担心是否会变回吃“大锅饭”。国台办明确回应,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绝不是“杀富济贫”^[3]。第三次分配不是“劫富济贫”,也决不搞“逼捐”^[4],这是由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和第三次分配的特性决定的。其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但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整体划一、齐头并进的一刀切,而是要根据我国地区之间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资源禀赋、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会实现“先富”。“先富”是“后富”的样板和动力,能带动“后富”发展,是实现“共富”的路径;“共富”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必然归宿,是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其二,第三次分配制度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非强制性。“先富带动后富”是一个逻辑整体,要鼓励“先富”,但其目的也在实现“共富”,以此来体现社会公平。从“先富”的主体来看,任何企业都是社会中的企业,都必须兼具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能够回报社会的企业,才能够得到社会和人民的认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次分配就是类似于见义勇为的社会倡导的高尚道德行为,企业和乐于捐助的高收入人群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崇高情怀,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回报社会是建立在“非强制”基础上的高度自觉。

随着公益慈善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许多学者更多地从捐赠及慈善组织本身出发,探讨慈善管理机制及相关法律、财税政策等问题,认为第三次分配就是依靠道德力量发展慈善事业。但是正如王名等学者所说,厉以宁提出第三次分配概念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他强调道德力量的作用其实质上关注的是市场伦理和市场经济未来走向的宏大命题^[5]。而如今更多的则是强调公益慈善这一狭

窄领域和慈善组织单一主体,依靠道德习惯的力量,显然不够透彻和深入。针对第三次分配的内涵,本文将从驱动力和参与主体两个方面予以讨论。

关于第三次分配的驱动力问题。厉以宁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这一专著中进一步探讨了道德力量的作用,甚至强调道德因素比市场和政府因素出现得更早、更本源^[6]。的确,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道德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分配的实质就是资源和财富的配置,对于资源和财富的第三次合理配置,仅依靠道德力量恐怕要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早已达到了共同富裕的水平,对于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按需分配,那么第三次分配实际上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纵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从提出到发展再到逐步完善,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都是多领域协调发力的结果,第三次分配也不例外。要想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法律体系的协同发力,更离不开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关于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指出,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关爱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7]。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是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家。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8]。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拥有大量财富的“先富们”。让“先富”带动“后富”,调整分配格局助力共同富裕的时机已然成熟。但是,本文认为,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不仅限于高收入者,普通群众也可以参与其中。共同富裕本就是共建共享,只要自愿参与,人人都是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

普通群众虽然没有大量的财富，但是并不妨碍施行慈善之心，可以自愿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人多地广，同时富裕是不现实的^[9]。要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全面实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10]党的十八大以来，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完成脱贫攻坚这一“底线任务”，取得关键性胜利，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擘画2035年远景目标时，规划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进度表和路线图，明确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1]的目标。那么，共同富裕与第三次分配有何内在的必然联系？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结合初次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和三次分配制度的作用和差异，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从分配制度的作用来看，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要想真正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2]。初次分配旨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提高效率，力争把“蛋糕做大”；再次分配旨在发挥政府作用兼顾公平，力争“分好蛋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辅相成，在缩小城乡差

距、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问题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公平与效率仍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进而暴露出仅靠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不足之处。长此以往，必将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成为共同富裕道路上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拦路虎。此外，纵观实现共同富裕的历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更多地依靠政策力量推进，政府起到主导作用。而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不同，第三次分配更加依靠社会力量去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无疑又拓展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途径。如果能把政府力量与社会群体力量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那么共同富裕就可以实现“两条腿”走路，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因此，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必然要求构建更为完善科学的分配制度，在发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作用的同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从共同富裕的本质来看，共同富裕就是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让人民在实现共富的基础上同时共享。需要明确的是，共同富裕的确要实现共建共享，但绝不是搞“平均主义”。“共同富裕虽强调人人享有，但绝不是靠政府大包大揽，更不允许出现‘养懒汉’‘等靠要’等现象，共同富裕必须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13]因而要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14]。一方面，在初次分配领域公平从来不是收入分配考虑的重点；由于税收调节、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力度有限，社会保障存在地区性差异等因素，再分配政策也未能有效地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高位水平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成为推

进共同富裕绕不开的难题。而第三次分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收入群体自愿将财富资源转移到低收入人群手中，这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就是缩小收入差距且指向性明显，因此第三次分配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强效助推剂。另一方面，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法治建设也日益完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第三次分配的发展提供了日益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保障。对新时代提出的缩小收入差距这一课题的破解以及我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发展所提供的客观条件，为第三次分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从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来看，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不仅是要达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共同富裕。就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维度而言，第三次分配发挥着独特的优势。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富强，我国高收入群体比例不断提高，所谓高收入群体在通常意义上就是摆脱物质匮乏的“先富”的人群^[15]。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还是河南暴雨救援，越来越多的高收入群体愿意捐款捐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公共事业和慈善活动的参与度的提高，对于高收入群体自身而言，在帮助他人、关爱社会的同时，也是在满足高收入群体自身对于精神生活更高追求的需要^[16]；对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引领社会向善文化、营造良好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简言之，第三次分配的实现不仅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而且能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更好地助力精神生活这一维度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的主要构成

探索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就是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的主要构成及如何激发参与主体的活力。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关于第三次分配的内涵解读时提到参与

主体问题，本文认为，只要有着一颗慈善之心，愿意为共同富裕贡献自己的力量，人人皆可成为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其中党员干部、高收入群体以及慈善组织是主要构成部分，极大地激发其活力，必然能使第三次分配充分发挥作用，要予以重点关注。

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要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9514.8 万名^[17]。历经百年风雨，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变强，党员总量在稳步增长，党员队伍结构日益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抗震救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等任务中，党员干部的身影从未缺席，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处处彰显。第三次分配的顺利开展，同样也离不开党员干部的带头与示范。

改革开放 40 多年，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也涌现出一大批主要包括企业高管、影视人员等高收入群体。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加强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地回报社会^[18]。第三次分配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高收入群体自愿将财富资源转移到低收入人群手中，因而，高收入群体必然会成为第三次分配的主力军。

此外，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共同富裕成为国家发展重要目标的时代背景下，慈善事业也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19]。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曾说过：“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并包含有初次分配、再分配份额在内的混合型财富分配机制，是先富帮后富、有能力者帮有需要者的宏伟社会事业。”^[20]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慈善组织的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推动开启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四、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在厘清第三次分配的参与主体之后，其实现路径问题便不难解决。实现路径的核心就是要激发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的活力，发挥其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问题，也是关乎第三次分配能否实现的一大重点。

（一）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企业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企业党组织作为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企业员工和推动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第三次分配事关共同富裕和发展全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企业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为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发展开创新局面。企业党支部是企业政治工作开展的基石，在企业内部贯彻新时期党的方针路线，深化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建设，提高企业凝聚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企业建设中，只有全面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的方针政策才能有效贯彻落实。第三次分配制度的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企业党支部要响应国家号召，发挥企业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让企业党支部与先进的时代思想引领社会潮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成为人们的发展共识，以“中国梦”为载体，树立积极向上的文化经济氛围^[21]。此外，大力宣传慈善意识，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组织相关讲座及活动，加深对于慈善意识和第三次分配制度的理解，积极的组织或参与到慈善等公益事业中去。

（二）为慈善事业提供正向激励和法律保障

第三次分配的提出与强调，将使我国慈善事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重大变化。基于此，要完善相关政策，营造良好的慈善氛围，发挥政策的驱动作用，如放宽企业税前列支政策等，助力企业再投入再发展，同时要着力打造正向激励个人捐赠的免税限额措施，推动形成人人向善、人

人行善的社会环境^[22]。此外，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第三次分配制度的贯彻实施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目前，我国涉及慈善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以及国务院发布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23]。此外，财政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中也有部分条款涉及慈善事业，但这些涉及公益的法律法规总体而言不是特别完善、数量不多，必须积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三）鼓励高收入群体回报社会

要鼓励高收入人群回报社会，将自身的长远发展融入共同富裕的大场景。2021年“99公益日”，近万家慈善组织和爱心企业参加，超过6870万人次捐出35.69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的6亿元资金支持，总共募集善款41.69亿元^[24]。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形成积极的社会效应。

鼓励高收入群体回报社会，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现行所得税政策对社会资本进入慈善捐赠存在一定的抑制性作用。日常发生的大批量、小金额、社区性的企业捐赠难以获得减免税凭证，这直接对个人、中小企业和社区性公益机构的捐赠和募捐产生了一定制约^[25]。西方国家慈善事业蓬勃发展，这与他们采用的“疏堵结合”的方法，通过完善税法来激励高收入人群捐赠的做法是密不可分的。要积极探索针对捐赠的相关税法条款，简化慈善捐赠所得税减免程序，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税法等，完善我国相关税法，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发展。

（四）推动三次分配政策协调配套，共同助力共同富裕

首先，重视第三次分配，绝非要割裂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而是要强化第三次分配的不可替代作用。第三次分配，有助于

克服初次分配存在的市场盲目和只重效率的弊端，同时又弥补了由政府调节主导、强调公平原则的再分配存在的短板。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释放第三次分配的动能，以调动全体中国人民参与其中，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才能发挥出无穷的潜力，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目标。

其次，三次分配唯有相辅相成，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效能^[26]。初次分配注重做大财富的蛋糕，为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再分配注重公平，政府主导规范市场秩序，为初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第三次分配的应运而生，正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结果。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断走上正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其自身的道德规范也在不断发展，为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发挥夯实道德和价值观基础。

此外，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的诸多驱动力如党的正确领导、法律的完善等同时也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起着重要作用。三次分配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密不可分。因此，要协调三次分配配套实施，让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总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三次分配的内涵也会与时俱进，其影响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大。要坚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探索第三次分配的实现途径。高度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让第三次分配在促进社会各阶层共享发展成果、走向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厉以宁.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77.
- [2][26] 耿中元. 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 [EB/OL]. (2021-09-16). <https://m.gmw.cn/baijia/2021-09/16/6/35169794.html>.
- [3] 陈舒，刘欢，石龙洪. 国台办：绝不是“劫富济贫” [N]. 新华每日电讯，2021-09-16(5).

- [4] 本报评论部. 保护合法致富鼓励回报社会 [N]. 人民日报，2021-10-18(4).
- [5][6] 王名，蓝煜昕，王玉宝，等. 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 [J]. 中国行政管理，2020(3)：101、102.
- [7] 陈小德. 浙江慈善：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推进共同富裕 [N]. 中国社会报，2021-04-26(2).
- [8][9]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1、155.
- [10][11][13] 张峰. 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新的庄严承诺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24)：7、13、13.
- [12] 王伟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概括：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J]. 经济学家，2021(6)：13.
- [14] 蒋永穆，豆小磊. 共同富裕思想：演进历程、现实意蕴及路径选择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15.
- [15][16] 周丹，罗新茂. 高收入群体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 [J]. 马克思主义哲学，2022(2)：92、92.
- [17] 党员 9514.8 万名 基层党组织 486.4 万个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伟大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始终保持旺盛生机与活力 [J]. 新长征，2021(7)：33.
- [18]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N]. 人民日报，2021-08-18(1).
- [1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9.
- [20] 金灿. 完善慈善法制促进共同富裕 [N]. 经济参考报，2021-09-28(8).
- [21] 李彩玲. 如何发挥企业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19(12)：198-199.
- [22] 陈秋雄.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J]. 中国民政，2022(5)：37-38.
- [23][25] 杨文森.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探析 [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9)：68-70.
- [24] 舒迪. 互联网公益：助力共同富裕新途径 [N]. 人民政协报，2021-09-14(9).

责任编辑：王天海

论列宁民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张 婷

摘 要: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先河,其民主思想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对苏俄所处国内外形势的准确把握,主要包括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扩大人民民主参与、完善民主程序管理,为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坚持党的领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法治建设、坚持人民为中心等维度提供了现实指向。

关键词:列宁;民主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51-06

列宁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开创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1]。列宁在结合苏俄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容丰富、意蕴深远的民主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民主的实践经验,深化了对民主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断,构筑了人类民主新形态。列宁民主思想不仅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事业也有巨大的借鉴价值。

一、列宁民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任何一个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列宁民主思想也不例外。

(一)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继承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切入点,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刻剖析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创立了科学民主理论,回答了“民主的本质、实现、发展”等问题,实现了人类民主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3]其本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压迫另一阶级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任何超阶级民主。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了民主的人民性,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4]。“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5]揭示出民主的核心是人民,国家权力亦是人民所赋予的。

收稿日期:2022-06-13

作者简介:张婷,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政治、法治等条件才能实现。一要有经济基础。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经济发展稳定、人们生活有所保障、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能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有效促进民主政治发展。二要有政治前提。“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6] 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必须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确保民主的领导力量及其人民性。三要有法治保证。“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7] 民主政治要有序进行，必须依托法律捍卫人们的合法利益诉求，进而捍卫民主本身。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不存在任何速成民主。民主作为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变化发展，包含一个从低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到更为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过程。同时，民主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和国家、阶级一样，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未来共产主义阶段时，阶级、国家都会消亡，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也会随之消亡。“但作为管理形式的民主将始终有其存在的价值，不会消亡。”^[8]

（二）对苏俄所处国内外形势的准确把握

从国际背景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因为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不平衡，导致殖民地与世界霸权的争夺变得愈加激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了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由于这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激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0 多个国家卷入战争，一方面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和殖民地人民觉醒。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为列宁民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阶级基础。

从国内背景看，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连失败，损失惨重，国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再加上当时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政权腐朽，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人民无比渴望和平。1917 年 3 月，二月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况。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没有满足当时俄国人民提出的迫切要求，而是继续进行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奴役贫苦劳动人民，还想方设法遏制国内的革命火焰，这激发了人民的强烈不满。1917 年 4 月，列宁结束长期流亡回到俄国，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革命。1917 年 7 月，战争前线溃败的消息传到彼得格勒，引发了群众愤慨，布尔什维克领导众多工人、士兵举行和平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也随之结束。1917 年 11 月，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也得以建立。列宁在政权建立后，积极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列宁民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列宁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党内民主建设，确立民主领导力量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离不开共产党这个核心力量的领导，离不开良好的党内民主建设状况。列宁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建设，特别是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进行了一番思考和探索。

1. 坚持党的集体领导

列宁认为，建设好党内民主，必须具备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以便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因决策分歧引起党的内部分裂，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建设党内民主一方面要求党内要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没有意见分歧，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9]。

但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合理解决党内分歧争端，防止个人专断，需要党统一领导，通过集体的经验智慧解决问题。

2. 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十分重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提出实行年会制。列宁继承了这一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中规定“代表大会由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每年一次”^[10]，使党内事务能定期通过党的代表大会进行民主讨论，激发党员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党的封闭性，促进党内民主发展。

3.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党是民主建设的领导力量，党员作用自然不可忽视。党员一律平等并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是进行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基础。列宁认为，如果所有的政治问题都采取征询全体党员意见的方式来讨论决定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11]。

4. 加强党内作风建设

建设好党内民主离不开优良的党内作风，列宁对此进行了不断探索，可将其总结为“公开、自由、敢于自我批评”。“公开”是指党的事务要在党内外进行公开。“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12]“自由”是指讨论自由，“在各个组织内或在全党内自由而切实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13]，营造良好的党内民主氛围。“敢于自我批评”是指对党内出现的错误、缺点要敢于公开承认，并及时改正，“共产党人的责任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14]，以此来活跃党内思想斗争。

（二）实行民主集中制，构建民主组织原则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经历了从主张集中制到

创建民主集中制的发展历程。

首先，作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15]，并把党内民主纳入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民主和集中并不冲突，“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因此必须弄明白，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同官僚主义集中制，另一方面同无政府主义有多么大的区别”^[16]。党内既要实行民主制，防止一言堂和个人专制；又要实行集中制，防止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作为国家结构的组织原则。列宁之所以将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展到国家建设层面，是来源于他领导俄国建立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实践。1917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一个多民族的俄国如何选择国家制度的问题。在进行一番探索后，列宁认识到在此种特殊情况下，实行联邦制和自治制也是可取的，但这只是向真正民主集中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将中央的统一领导与地方自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结合起来。

最后，作为经济管理层面的组织原则。列宁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强调，“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运输部门等经济企业在发挥其职能时绝对的协调和统一”^[17]。企业生产发展既要求员工积极献策，践行民主，又要求一个坚决果断、善于处理实际问题的人来领导企业并对其状况和活动向国家负全部责任^[18]。

（三）扩大人民民主参与，维护民主主体地位

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有民主，并超越于资本主义民主之上，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使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

主”^[19]。在这里，列宁将民主的主体延伸扩展到了人民民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回顾俄国革命历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巩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列宁也一直强调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的政权，要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管理，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意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列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障人民民主在民主建设实践中真正落实。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民主是上层建筑，归根结底由经济基础决定，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20]。二是大力发展教育。俄国革命发生时，还处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人民文化素质不高，但“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21]，因此必须先对民众进行教育，提高基本文化素质，使其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四）完善民主程序管理，深化民主过程实践

良好的民主秩序是民主建设的重要保障。虽然列宁没有在著作中明确提出民主程序的有关概念，但他十分重视民主过程管理，对民主过程各个阶段均有过论述。

1. 保障民主选举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基本政治权利，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列宁的民主选举思想来源于巴黎公社，马克思概括出巴黎公社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公社委员全部由工人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列宁根据这一原则，主张苏维埃政权也要实行选举制，由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机关，参加公职人员的选举，并保证国家机关能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22]

2. 科学民主决策

列宁的民主决策思想率先体现在其党内民主

建设思想中。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并决定党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使党员能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列宁还主张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但依然会尊重“少数”的意见和权利。除了党内，党外一些国家机关决策也要如此进行。

3. 完善民主管理

民主管理是相对绝对服从、绝对权威而言，管理者充分尊重人们意见主张看法，秉承公平原则，营造民主氛围，实现协调管理。列宁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主张普遍吸收所有劳动者管理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几个人就能实现的，只有千千万万人学会管理，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但是，所有人参与国家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列宁又提出实行代表制，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

4. 健全民主监督

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面临着长期执政情况下权力能否正确使用的问题。权力只有受到监督，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由于苏维埃政权是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为了巩固政权，大部分命令都是由党中央下发，存在权力过度集中的隐患，1921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尤为明显。对此，列宁从维护人民权利的目的出发，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监督，“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发展”^[23]。同时，辅之以法律、制度的监督，通过国家机构改革，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将党、国家机关、领袖人物等置于监督之下。例如，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立法职能，改组工农检察院，并将其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相结合。

三、列宁民主思想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指向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俄国特色的民主思想，使民主理论达到新的高度，开创了社会主

义国家民主建设的先河，提供了成功范例，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性质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属于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探索的新成果，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4]，决定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再者，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文化多样的大国，在这样的大国中，“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来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25]。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且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第三，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证明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党一直致力于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引着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有效遵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还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26]。新时代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遵循组织原则，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集中。

首先，必须坚决反对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制衡”。“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

政治制度的组织原则，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掌握在不同的国家机关手里，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来，这种三权分立是民主的标志，但是现实表明，实行三权分立非但没有建立起一种高效的民主政治，还出现了因意见分歧导致政党相互掣肘、决策效率低下的状况。再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状况相适应的，这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不相适应。其次，必须始终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并把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既要民主集中制贯穿于党的各项实践活动，也要将其贯穿于国家机关的运作治理，“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27]。

（三）加强法治建设，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保障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8]。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保障。

一要不断坚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宪法规定了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和基本的权利、义务等，党还紧紧围绕与人民密切相关的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领域的问题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使每一项法规都体现人民意志。二要坚持完善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民主制度是实现民主目标的载体和基本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规范和引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2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

深化治国理政实践,积极探索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构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具体制度,使人民民主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四)坚持人民为中心,切实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30]。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发挥其实质作用。

关键要保障人民全过程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说:“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31]2021年,他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又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强调民主过程的全面、真实、有效。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系统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广泛真实的民主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因此,要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性作用,必须保障人民的全过程参与。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3][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0、281、18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0.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1.
[8] 陈曙光.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5):86-95+160.
[9] 沈云锁,潘强恩.共产党通史:第2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2.
[10][13]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G].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7、87.
[11] 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50.
[12]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7.
[14]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5.
[15] 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5.
[16][17]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9.
[18] 许耀桐.关于列宁民主集中制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再探讨[J].党政研究,2020(5):68-75.
[19]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20][22][23]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0、723、506.
[21] 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9.
[2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69.
[26][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5、63.
[2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
[29] 蒯正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9):73.
[30]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2).
[31] 杨振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彰显中国式民主优势[N].人民日报,2021-08-04(9).

责任编辑:鲍跃华

雨花英烈精神的生成逻辑： 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

谢 军

摘 要:雨花英烈精神作为早期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红色精神之一，它的形成是社会现实、精神文化和科学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和逻辑基础，是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有机结合。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背景为雨花英烈精神的生成提供了现实性；民族精神、政党品格和社会责任为雨花英烈精神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为雨花英烈精神的生成提供了必然性。

关键词:雨花英烈精神；现实性；可能性；必然性；逻辑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57-04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培育和發展了一系列伟大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精神谱系，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为主要内涵的雨花英烈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雨花英烈精神作为早期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红色精神，它的形成是社会现实、精神文化和

科学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和逻辑基础。

一、内忧外患的社会历史背景是雨花英烈精神生成的现实前提

任何一种精神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雨花英烈精神之所以能形成，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是分不开的。雨花英烈们普遍具有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情怀，他们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在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一是现实向理性的超越。鸦片战争后，民族

收稿日期:2022-06-07

作者简介:谢军，南京市委党校雨花台分校高级讲师。

危机加深，中国的社会现实使雨花英烈们产生了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想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流行于中国的理论和思潮众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新村主义等，但这些理论和思潮都没有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去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救国救民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坚定地选择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路，这是他们深思熟虑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一时的冲动和暂时的喜好。面对威逼和诱惑，他们之所以能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维护党组织的利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天下的劳苦大众谋取幸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易于为中国人民接受，成为救亡图存的科学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成为雨花英烈精神文化的重要土壤。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谢文锦深受鼓舞，他开始密切关注世界革命动向和国际形势，革命热情不断高涨，爱国信念日益坚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深入社会基层，投身现实斗争，开始思索如何探索救国道路。1921—1924年，谢文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回国后，他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1925年4月，他撰写了《列宁与农民》系统阐述农民问题，对党从理论上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推进工农联盟，起到了理论奠基和思想引导作用。本着对党的忠诚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坚守，谢文锦被捕后宁死不屈，成为雨花英烈之一。

二是理性向现实的回归。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他们一方面著书立说，宣传革命理论；另一方面，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帮助工人和农民学文化，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雨花英烈张霁帆早年积极参加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霁帆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为加强对河南地区农民斗争的领导，张霁帆奉命深入豫西乡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农民对地主开展斗争，使豫西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还根据斗争实践，写成《介绍河南红枪会》一文，为党开展农村工作积累了经验。被捕后，他拖着病体毫不屈服，最终英勇就义。

二、民族精神、政党品格和社会责任是雨花英烈精神生成的可能性条件

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性质决定了道德体系的性质。但道德并不是对社会被动的反映，而是主体基于社会现实和社会规律做出的理性选择。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激发了雨花英烈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雨花英烈集中华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同身份于一身，同时兼具相应的品质。

一是具有严格的组织观念。纪律意识是无产阶级政党最显著的特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规定：“盟员必须承认共产主义，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必须参加‘同盟’的一个支部活动。”^[1]无数雨花英烈被捕后仍能保持对党忠诚，具有极强的组织观念，为了维护党组织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不为敌人威逼利诱所动，不背叛党组织，真正践行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和党性原则。雨花英烈顾衡被捕后，特务劝他投降，他义正词严地拒绝道：“如果要我写脱党声明，你们得先让我回去请示一下，看我们党准许不准许！这是一种信仰，是不能动摇的！”^[2]

二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雨花英烈精神的原生土壤，是热爱祖国、精忠报国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华儿女最普遍的认知和最基本的准则，经过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发

扬，爱国主义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总能凝聚力量，力挽狂澜，这也是雨花英烈精神的重要特质。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雨花英烈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全国大众的利益。罗登贤在赴刑场前，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3]

三是具有真挚的人民情怀。真挚的人民情怀是雨花英烈从事革命的精神动力，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虽然他们中不少人来自社会上层，家庭富裕，本可以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但为了理想和真理，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事业，普遍对劳苦大众比较同情，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品格和人民情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 马克思指出：“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缺的伟大人物。”^[5] 雨花英烈谭寿林以饱满的热情进行诗歌创作，真实反映农民的艰辛，揭示黑暗的现实，以启发农民的革命觉悟。谭寿林省吃俭用，将自己的生活费定为每月不得超过3元，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帮助困难同志。由于无法给予年老体弱的父亲相应的照顾，谭寿林十分愧疚，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表明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想，即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不可计较个人和家庭的得失。

三、实现共产主义、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雨花英烈精神生成的必然性目标

雨花英烈中的不少人，家境相当宽裕，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个人发展机遇良好，但面对富贵，他们选择清贫，面对安逸，他们选择危险，面对生的希望，他们选择牺牲，充分展示了雨花英烈们崇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雨花英烈们毕生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雨花英烈精神生成的

理论基础和价值支撑。一方面，他们之所以选择共产主义理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共产主义理想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趋势，雨花英烈准确把握这一时代脉搏和历史规律，铸就了雨花英烈精神的科学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他们之所以选择以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是因为他们深谙历史规律。有国才有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每个中华儿女应有的精神品质，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要义，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同时，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谁代表人民群众，谁就能获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雨花英烈在努力践行这一科学真理和价值理念，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理想信念。

一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勇于献身。雨花英烈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指引下，一定能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在南京及周边地区从事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1927年3月，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妇女部部长的张应春，积极组织妇女运动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她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奔走，四处演讲，揭露军阀的反动行径。她在《吴江妇女》上发表文章称：“革命的事业没有流血是不会成功的。……我亲爱的女同胞，大家起来奋斗吧！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泊里边，找到光明的道路，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6]

二是为民族复兴而不懈斗争。从1927年4月到1934年12月，中共南京组织先后遭遇八次破坏、八次重建。其中孙津川、顾衡等人先后担任南京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雨花英烈陈处泰、丁行、杨振铎等曾经两度入狱。“打断了双腿，也打不断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这是曾任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的陈处泰在被捕后，面对敌人

的严刑拷打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1933年，由于叛徒告密，陈处泰一度被捕，因敌人未查出他真实身份而被释放。1935年11月，陈处泰再次被捕，身份暴露，牺牲于1937年，年仅27岁^[7]。

三是坚持走群众路线。雨花英烈能够在当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持续开展地下斗争，与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中共六大之后，在安徽工作的共产党员顾衡，深入农村基层，开展群众工作，白天和农民一起干活，晚上和农民沟通交流，还广泛发动农民进行救灾、抗租、均粮斗争，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为白区地下斗争持久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综上所述，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共同构成了雨花英烈精神的逻辑支撑和学理基础，促成

了雨花英烈精神的逐步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雨花英烈精神的形成，是社会现实条件的深刻反映，是科学社会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 [1][3][4][6][7] 雨花英烈精神解读 [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66、97、129、201、173.
- [2] 王修智，岳增瑞.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领导理论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56.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

责任编辑：宋好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创新研究

刘志礼 李佳隆

摘要:网络人士作为新时代的统战对象,在阶层力量、思想政治、网络行为等方面呈现出崭新样态。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凝聚网络人士共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强化党对统战工作领导、打造专业化统战队伍、培育网络代表人士、树立求同存异的统战理念、坚持团结联合的本质要求、健全配套法规体系等具体举措,以提升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实际效能。

关键词: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策略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61-06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网络人士“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1]。新时代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需要在为什么要重视网络人士、怎样培养网络人士以及发挥网络人士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的地位作用上下功夫。

一、新时代网络人士样态表现

当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就业形式、社会分工和社会治理方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网络人士大量涌现。作为新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研发者、应用者和网络内

容的生产者、传播者,网络人士熟悉互联网技术、了解网络舆论传播规律,其中不乏极具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揭示新时代网络人士的群体规模、思想动态、价值取向、政治态度、网络行为,是准确把握网络人士群体特征的重要手段,也是精准制定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策略的重要依据。

(一)“总体壮大”与“代表性优化”:网络人士群体样态发生深刻变化

网络人士作为我国网信事业发展过程中孕育而生的群体,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网络人士群体规模不断发展壮大,主要通过内部成员的构成、来源、发展态势表现出来。第一,网络人士内部成员整体重构。党的

收稿日期:2022-06-19

作者简介:刘志礼,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佳隆,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XZK2020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十八大以来,随着新媒体产业强劲发展,网络人士群体快速成长、日渐壮大。然而,由于网络平台准入门槛较低,普通网民不仅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表观点、分享日常,也可以从事直播带货等经营性活动积攒一定的粉丝,普通网民向网络人士转变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网络人士规模持续壮大。第二,网络人士成员来源广泛。既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又囊括身份庞杂的网络“意见领袖”,涉及专家学者、媒体记者、娱乐明星、草根大众等不同人群,关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覆盖国内、国外不同地区,其总体构成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

网络人士总体规模不断壮大,但群体内部构成多元,影响力不尽相同。在网络人士群体内部竞争和国家外在培育的双重影响下,网络代表人士队伍不断优化。一方面,网络代表人士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一部分人还有过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视野开阔、自主意识较强,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焦点,并能熟练地通过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见解。尽管网络人士群体内部不断竞争分化,但网络代表人士队伍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优质状态。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有计划地加强和改善网络代表人士工作,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成长环境,使其成员能够更加有序地参与网络活动。此外,国家不断强化举措,加大管网治网力度,有效规范了网络行为,使网络代表人士的网上“声音”更趋理性。

(二)“正能量主导”与“负能量并存”:网络人士思想样态呈现多元差异的复杂特征

当今世界正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革命性演变加速了全球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对抗,不同的文明形态、多元的社会思潮、复杂的社会情绪深刻地影响着网络人士的思想。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剧了网络人士思想观念和政治态度的分化。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匿名性,网络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去中心化特征也加剧了网络人士思想的复杂变

化。网络人士群体的思想观念、政治态度、价值取向,通过虚拟网络场域中不同指向性的外在网络行为呈现,并反映其正负效能。

在思想观念领域,大多数网络人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思想认同,热衷于弘扬主旋律,参与回馈社会的公益慈善活动。在政治态度领域,绝大部分网络人士认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政党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特别对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彰显出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有着强烈的认同,坚定地支持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然而,网络人士群体构成的差异性,决定了其观念、想法也复杂多样。当前,“网络空间情况复杂,主流当然是好的,但也有很多杂音噪音,甚至有很多负面言论”^[2]。这些负能量因素会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出场,并与主流价值观产生交织、冲突与对抗。第一,利益分化加剧。随着我国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网络人士群体内部分层分化趋势越加明显,群体成员间利益不断分化,诉求更加多元。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影响着网络人士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参与意识,极少数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散布社会负能量,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第二,敌对势力影响。极少数网络“异见人士”在反对势力的影响下,在网络中激进偏激,热衷于对党和政府行为进行非理性批评,甚至蓄意攻击。第三,宣泄消极情绪。当网络人士自身利益受损或受到外部不良影响,有时会通过网络平台发泄消极情绪,这些负面信息容易在网络虚拟环境中传播发酵,甚至被敌对势力利用。

(三)“借网发声”与“以网谋生”:网络人士行为样态倚重网络且具影响力

如今,互联网已经嵌入到人类日常生活当中,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网络时代的“搭台”与“唱戏”者,网络人士扮演着网络经营主体和网络发声主体的重要角色,其行为方式通过网络呈现,并在不同

场域产生影响。

网络人士作为离互联网最近的群体，无论是日常收入，还是社交活动、消费娱乐、情感表达，其发生场域和方式都在由现实生活场景向网络虚拟空间转变，并通过网络围观公众议题、传递个人观点。特别是网络代表人士，凭借自身丰富的知识储备、敏锐的职业嗅觉、精准的判断能力和熟练的业务水平，往往能够从海量的社会信息中识别出有效信息，并对信息去伪存真、加工处理、分析思考，从而将碎片信息进行精细加工，并转换为有特殊意义的信息，有计划、有意识地将社会热点以“公众议题”形式对外输出。若网络代表人士形成网络集群持续跟踪分析与深度解读信息，便可将“公众议题”推向“舆论焦点”，并凭借其圈层动员能力，使相关话题短时间内在网络空间迅速传播。

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第一信息源，深刻改变着信息获取渠道和舆论传播方式。网络人士是构成新时代网络信息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他们借助互联网平台发表个性化观点，其观点会根据议题设置和话题阐释程度在境内外不同时空场域震荡、发酵，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多数网民的态度倾向，因此在网络舆情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以乌合麒麟为代表的网络人士，因发布讽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虚伪性的漫画作品，不仅在国内网络领域带动起守护国家形象、正确看待西方制度的话题，收获国内网民的赞誉和支持，而且凭借内容强大的冲击力，轰动了整个世界舆论场，对于突破西方意识形态围堵、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客观真实报道中国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在流量经济极速发展中，网络人士也凭借着强劲的话题推送力，在收获流量分成、经济效益等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收获了大量粉丝，不断巩固自身的网络话语权威。

二、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价值

深刻领会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对于

巩固党的执政之基、凝聚网络人士共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是新时代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党的执政之基的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政治优势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3]

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的对象、范围、主要任务随着统一战线使命任务的变化而同步调适，并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紧密耦合。网络人士是伴随着新时代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而涌现壮大的新兴群体，特别是其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其数量、规模、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战工作及时地回应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动态调整统战对象，在扩大统战对象范围规模的同时，也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网络人士在促进网络经济发展、网络监督问政、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发挥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群众力量。将网络人士纳入统战视野就是在最大范围争取人心、汇聚力量，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网络人士与党同心同行，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是抵御外部环境干扰、凝聚群体思想共识的有力武器

“统一战线得以形成的基础是存在与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利益、价值‘相同’和‘相异’的群体。”^[4]在多元社会思潮共存的当今社会，网络人士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必然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同向”和“相异”的群体。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凝聚群体成员思想共识，使其政治立场、网络行为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与中国共产党展开争夺网络人士人心的较量。“各种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5]因此，要通过发挥统战工作的优势，及时帮助网络人士认清外部复杂环境和敌对分子真实意图，澄清网络人士在思想观念、政治态度方面的模糊认识，凝聚起网络人士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保证其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和国家事业建言献策。

当前，网络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新媒体所表现出的“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6]，使网络舆论环境日益复杂。要通过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凝聚共识的“最大增量”，巩固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通过统战工作实现网络人士资源整合，“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成政治整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成价值整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制度整合，用充分体现效率和公平的社会公正机制实现利益整合”^[7]。引导网络人士将爱国的内在情感外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行动。

（三）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强国奋斗目标战略举措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网络强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发挥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将网络人士与强国战略相契合的自身优势整合进实现强国奋斗目标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聚合网络人士建设现代化强国、服务党和国家全局战略的效力。

通过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可以让他们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和网络人士之间的联系，健全网络人士联络机制，丰富协商民主形式，保障网络人士的合理诉

求、合法利益，使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制度能更好地体现网络人士的意志，进而激发其干事创业的热情。通过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及时发现优秀的网络代表人士，充分发挥他们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智库作用，不断提升党做好网络人士工作的制度化水平，使统战工作更好地为治国理政服务。

三、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8]

（一）强化党对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领导

新时代加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党委对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要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的网络人士大统战工作格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不仅需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更需要“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9]，汇聚全党和全社会力量，搞好分工协作，齐心协力相互配合。第一，发挥统战部门的主体作用。下功夫做好新媒体行业代表人士和网络意见领袖的工作，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更好地履职尽责。第二，发挥各职能部门的合力作用。网络人士工作涉及宣传思想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充分发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在重大关键问题和复杂难点问题上的决策、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对网络人士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制度的顶层设计。宣传部门要承担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使命，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第三，互联网企业、新媒体行业要自觉承担网上信息管理的责任，建立企业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密切协作关系，真正实现网络

人士统战工作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二）打造专业化网络人士统战队伍

“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10]建立最广泛的网络人士统一战线，需要有一支党性强、业务精、懂技术的网络人士统战队伍。第一，打造高度重视网络人士统一战线工作的“四有”干部。统战工作无小事，处理不好可能就会影响大局。从事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人员更要强化政治意识，坚持统战工作的政治性导向，始终将统战工作纳入到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全过程，始终做到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网络人士服务、为本职工作尽责。第二，打造熟练掌握统战理论政策的行家里手。统战干部要深谙统战门道、掌握统战知识、增强统战本领，同时，要将统一战线基本规律与网络人士工作的特殊性紧密结合，灵活运用统战政策，协调与网络人士的关系，处理涉及网络人士的各种问题。第三，打造精通运用网络信息技术的能工巧匠。网络人士群体在日常工作、学习、社交活动中都离不开互联网，从事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干部也要熟练将信息技术嵌入工作中。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掌握网络人士社交言论、思想动态、政治态度，做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发展态势，不断增强统战工作的预见性、可控性、主动性。

（三）精心培育网络代表性人士

“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11]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要多交朋友、交好朋友、交与党肝胆相照的挚友，并且精心培育其中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士。第一，成立专门联谊组织。网络人士多从事体制外工作，岗位流动性较大，个体化工作倾向显著，缺乏相应的专业性组织。通过成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新型社会团体“网络界人士联谊会”，打造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网络人士自媒体联盟”等，将分散的网络人士组织起来，打造团结凝聚网络人士的阵地，确保网络人士统

战工作提质增效，为统战工作聚心、聚力、聚能、聚效。第二，培育网络代表人士。网络代表人士是网络人士队伍中的“关键少数”，要善于发现网络人士内部的人才精英，通过与广大网络人士多接触、多谈心、多了解，挖掘、培养、使用网络代表人士。第三，要善于做好其思想工作，通过培训等提高网络代表人士履职尽责能力水平，并充分尊重、信任、用好人才，使其各展所能、各尽其才，起到突破一点、带动一片的效果。第四，培育青年网络人士。互联网主要是年轻人的事业，青年网络人士既是网络新媒体的受众，也是改善网络生态的重要力量，特别要发掘、培养高校青年网络代表人士，通过线上网络舆论引导和线下思想政治教育，使其与党同心同行。

（四）树立求同存异的统战理念

统一战线工作要正确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的关系。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要尊重包容差异、凝聚最大共识、分类精准施策。第一，包容引导不同声音。网络人士来自四面八方，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经历，很难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看得准、说得对、声音一致。统战工作者对于网络人士的不同声音要善于包容引导，对于批评建议要及时吸纳，对于怨气怨言要及时化解。第二，重视网上舆论斗争。统战工作者对于网络中充斥的杂音噪音和负面言论，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和鉴别力，要严密防范和抑制各种敌对势力利用网络人士从事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网上攻击渗透。要敢于开展舆论斗争，批驳错误观点、抢占话语权、打好主动仗，帮助网络人士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意识、纠正错误看法。第三，加强正面宣传。阵地是统战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当前，思想领域有红、灰、黑三个阵地，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去占领，各种腐朽思想和其他社会思潮就会蜂拥而上。要时刻牵住互联网内容建设这个“牛鼻子”，防止敌对势力与党争夺理论阵地、文化阵地、舆论阵地、网络阵地。要通过培育积极向上、健康向善的网

络文化,创新宣传形式方法,善于运用网言网语,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五)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12]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要围绕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汇聚网络人士最大力量。第一,增强“四个自信”以强信心。各级部门要落实好中央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精神,继续举办各层级的网络人士理论研讨班,邀请网络代表人士参加,通过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网络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共同的思想基础,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同,厚植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最大限度调动网络人士的积极性,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走好网络群众路线以暖人心。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通过线上线下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特别是网络群众路线,善于运用互联网了解网络人士的所思所想,收集有价值的重要信息,积极回应网络人士关切,努力把网络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第三,充分发扬民主以聚民心。通过建立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联系渠道,畅通网络人士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沟通渠道,及时关注、了解网络人士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维护网络人士合法利益,为其排忧解难。

(六) 构建完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法规体系

不断构建完善统一战线工作相关法规体系,为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第一,用好根本大法和党内法规。2020年12月,中共中央修订并印发了党内第一部关于统

战工作的专门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提供基本遵循,为具体做好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政治、组织、法治保障。第二,用好配套法律法规。我国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基本法律法规,要充分发挥现有法律法规作用,抓紧制定专项法规,形成法治震慑力、约束力和防御力,依法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第三,全体网络人士形成自觉守法的意识。要强化网络人士主动学法、懂法、遵法、护法意识,培育社会良知。同时网络人士要依法上网用网,文明理性表达自身关切,提高自身网络安全维护意识和防护本领。

参考文献:

- [1][2][6]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65、49、68.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57.
- [4] 何虎生,赵文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法宝、和合与平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1):130.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57.
- [7] 李俊.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政治”功能的思考[J].科学社会主义,2019(5):98.
-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8、18.
- [9][10][11][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8、139、138、128.

责任编辑:宋好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建设研究

高 静 张 悦

摘 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规模呈持续增长态势,他们具有专业性强、分布广泛、影响面广等特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以“结构—功能”分析为方法,通过功能检视总结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结构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主张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建设为功能导向,提炼标准化重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参考。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67-05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包括四个群体: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往往分布于新经济、新社会领域或自由业态中,是一支具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及创新创业活力的社会力量。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效组织起来,共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统战工作的内容之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框架愈发明晰,但工作中仍存在着身份认定模糊、工作机制有待健全、工作平台有待整合等情况。对此,本文将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法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格局,总结其面临的三个重要挑战,并为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建设提供可行方案。

一、理论框架:“结构—功能”分析法

“结构—功能”分析法是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进行社会现象研究的方法论总称,它成型于社会学家帕森斯,完善于社会学家默顿,从一种理论建构逐渐发展为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之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着眼于结构、功能、价值三者的关系研究,强调在一定社会价值规范的集成下,结构与功能互相影响,最终构成三者的动态平衡。在帕森斯的研究基础上,默顿提出结构影响功能,功能影响结构^[1],以辩证法的精神内核集中阐述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他认为功能有助于确定结构,正如这种结构有助于实现这些功能的有效性。此外,默

收稿日期:2022-04-16

作者简介:高静,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张悦,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顿还基于功能分析视角，对帕森斯提出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做进一步深入，提出显功能与潜功能，正功能与反功能、非功能的划分，以避免将社会行为的自觉动机与其客观效果粗心混淆^[2]，使功能分析失去意义。这里的显功能是指有助于系统调试，为系统参与方期望和认可的客观后果；潜功能是指无助于系统调试，系统参与方不期望也不认可的客观后果^[3]。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功能性强、目标明确、工作结构相对独立的特征。因此，可基于默顿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搭建分析框架，对现阶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功能特性与工作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整体性考察，并以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为功能导向，给出构建合理高效统战工作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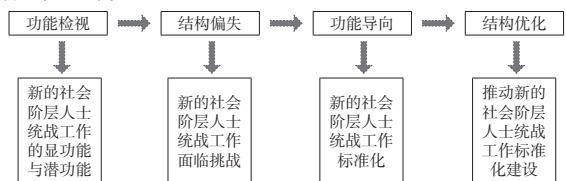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框架

二、功能检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显功能与潜功能

功能检视是结构调整的必要前提。默顿认为，有必要在解释具体行为的时候区分行动的主观目的与行动的功能后果，并以期望与否和正反向影响为标准对功能后果做二次细化。行动者直接期盼的、意料之中的可能后果是显功能，而潜功能则是行动者没有预料到的可能后果。潜功能又分为正功能和反功能，正功能就是没有预料到的客观结果的积极溢出，反功能就是没有预料到的客观结果的消极溢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显功能可以归结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可靠力量。这回应了党中央提出的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四个必然”的要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往往是“两新组织”和众多民间自组织中的重要人才。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是做好党对“两新组织”、民间自组织的领导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潜功能有正反两方面溢出。正的潜功能是指统战工作客观上促进了针对其合法权益与利益保护，畅通了其诉求表达渠道。反的潜功能是指工作开展不当、不力，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往往从事体制外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经济上，他们往往希望自己的合法权益与经济利益受到保护，或得到政策上的优惠倾斜；政治上，他们渴望畅通的参政渠道，以表达群体呼声。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长期活跃在体制外，教育背景与思想构成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如果不能采取有针对性、系统性的统战工作策略，构建主体责任明确、工作结构科学合理的统战工作格局，很有可能无法发挥统战工作的预期作用。

三、结构偏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面临挑战

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需结合其群体特征，创新思路方法及机制载体，保障思想引导有力、政治参与有序及组织协调有效。但是，实际工作中存在结构缺陷，离实现功能结构平衡的预期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存在短板

决策机制方面：缺乏成文的、规范的、可行性高的决策实施细则，实务工作中由于权责边界不够明确，部分地区存在着党委把方向与职能部门履职模糊交叉的情况，影响工作效率。倾听机制方面：整体来看，关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利益诉求的制度安排有待进一步明晰规范，倾听通道

有待进一步拓宽和畅通。考核机制方面：就大部分地区来说，工作开展的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科学细化，未形成独立的统战工作考核体系，存在着过于依赖年终考核、过程考核缺失、考核程序设计不够规范等问题。应该明确，和当前数量庞大、构成复杂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相比，基层统战工作基础略显薄弱，这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存在短板的主要原因。例如，原有基层党组织的统战工作机制还有待健全，尽管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基层党组织统战工作全覆盖，但仍有地区存在着“有名无实”的情况，定期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还有待加强。再如，部分专职统战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有待提升，这直接影响统战工作成效。此外，对统战工作对象需求的专项调研不够充分，这在客观上削弱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

（二）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认定有待进一步规范

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是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认定的基本标准。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合理、统一明确的具体指标设定。从现实来看，“业绩突出”在三项基本标准中最易衡量，往往成为主要的衡量指标，这造成对“政治坚定”和“群众认同”的考察虚化，使得选拔出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不足。

（三）统战工作平台建设分散，无法发挥合力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分布特性决定了传统统战手段的部分失效。为适应其群体特征，创新统战工作平台已经成为各级统战部门的共识。推动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制度性平台，不仅有利于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取得新进展，还有利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方面能力的有效发挥。但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平台建设也面临着缺乏统一部署、平台分散、资源无法整合等现实问题，这将导致统战工作整体性、系统性功能被削弱，工作效能受到影响。

四、功能导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内容界定

针对当前统战工作实务中面临的一些困境，需以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建设为功能导向，推动形成责任主体明确、工作体制机制健全、工作针对性与系统性强的工作结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建设主要涉及统战工作机制标准化、代表人士认定明晰化和统战工作平台建设标准化。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标准化

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标准化，就是要制定成文的规章制度和清晰的指标体系。基于当前的统战工作结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标准化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提升。在决策机制上，以明确权责边界为方向，形成统战工作决策实施细则，将责任落实到人。善于借鉴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经验，同时避免重复作业，找准统战工作重点，发挥统战工作的独特优势。在倾听机制上，以畅通拓宽倾听通道、建立明确的利益诉求倾听反馈机制为方向，积极回应统战工作对象的利益诉求。在考核机制上，以形成全过程、独立的统战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为目标，用考核促成效，让考核机制真正发挥作用。

（二）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认定明晰化

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总体规划，依据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的标准进行有重点地培养和选拔。在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认定明晰化的过程中，要以考察方向明晰化为目标。在指标设定中，应该将考察方向定为政治性、个人能力、群众基础的统一，其中以政治性为重。同时，要以考察指标明晰化为目标。在工作业绩量化的基础上，将“政治坚定”“群众认同”细化为可考核指标，选拔真正拥护党的领导，以及能够充分表达群体呼声的代表人士。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平台建设标准化

统战工作平台建设标准化，主要是指对统战工作平台建设流程、运行机制、系统推进进行全盘设计，理顺统战工作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关系并进行优化整合，实现统战工作规范化管理。一是搭建整合型统战功能平台。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构建统一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平台，完善统战目标群体的数据台账，公开统战工作开展流程，实施精准统战管理，有计划地推进思想引导、联络联谊、人才开发、社会服务等线上线下活动协同开展。二是搭建开放型、社会化平台。社会化运作需在依托统战部门与“两新组织”、民间自组织基础上进行提升。还要推动统战部门与基层党组织、行业协会、社团多方共建，构建开放型组织体系，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兴组织加入，进一步强化平台的集群效应。培育平台社会化运营主体，也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或财政补贴等形式，在平台管理运行中引入社会化机制。三是推行标准化管理模式。统战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抓好考核和督查工作；同时，负责制定创建标准，按统战工作职责、目标、任务、计划、项目等具体内容，列出主体工作标准、程序，通过经验复制、推广，推进实践创新平台标准化建设。

五、结构优化：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的对策建议

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社会结构相应发生新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亟须进一步加强。以工作的标准化建设为功能导向，设置科学合理的代表人士认定指标、系统推进工作机制规范和高质量统战平台建设，是构建统战工作新结构的有益探索。

（一）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标准化

首先，强化各级党组织的统战领导机制。各级党组织把这一统战工作纳入总体工作布局 and

要议事日程，统筹重点推进。由党委统一领导，依靠党组织工作力量，不断拓展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范围。各地应在设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明确统战工作职责并形成统战工作合力。

其次，推动工作机制标准化，要以明晰化的实施细则高标准推进统战工作。实施细则应至少包括党群共建机制、决策实施机制、分工协调机制、考核机制、联络机制等。还要推动建立规范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倾听交流和意见反馈机制。进一步规范参与政治协商的流程，在继续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各种协商形式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积极表达诉求同时，进一步规范参政程序，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效能。

（二）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身份认定指标体系

以现有代表人士认定方案为基础，将推动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身份认定指标体系列为工作重点。成立代表人士身份认定指标体系的工作小组，以充分保证指标体系规划的专业性；组织相关学者与一线工作者座谈，充分听取他们对指标设计的意见。除此之外，还应通过问卷调查、组织谈话等形式做好相关群体的调研工作，充分了解他们对群体代表的期盼。在政治性、业务能力、群众性比重的指标认定上，强调以政治性为先。关于政治性考察，主要考察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同，考察他们坚定“四个自信”的程度。

（三）搭建整合型统战平台

一是组织准备。各地统战部门牵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确立项目负责人，制定专项实施方案，在全面总结本地区统战工作经验、准确把握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特征、整合理顺现有工作资源的基础上，搭建具有地区特色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整合型统战平台。以整合型统战平台建设为抓手，构建科学合理、内容丰富、手段多样、

形式新颖、成效显著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格局，以规范化工作平台取得标准化工作成效。具体而言，整合型统战平台的规划，需要抓住政策资源，争取创新试点和政策倾斜，为推动统战平台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二是注重经验借鉴。在搭建整合型统战平台的过程中，应注重借鉴先进地区经验。2017年，15个城市被中央统战部列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试点城市，它们探索出一些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做法。2018年，为进一步推动、激励各地区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中央统战部下发文件，又确定34个城市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推广城市。这些城市已取得较好的工作成效。例如，杭州市就十分注重以平台化思维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建设^[4]，并创新打造“同心荟”统战工作平台，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统战资源的一体化整合。此类实践成果可以为其他地区的相关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是多元主体协作。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大多参与行业协会、商会、社团的领导管理工作，通过健全行业组织党组织体系及统战工作机制，

搭建以此为基础的工作网络，便于整合型统战平台的推广使用。此外，还可以依托行业协会、商会、社团组织等开展专门的平台使用培训，保证平台的实际使用效果。

应该明确的是，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标准化，并非主张各地忽视统战工作对象的特性，更不是主张利用相同的工作手段强制将本该多样化的统战内容趋同化。无论是工作机制规范化，还是代表人士认定明晰化，或是建立起整合型的统战平台，这些都将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分类分众施策的效能。

参考文献：

- [1][2][3]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M]. 唐少杰, 齐心,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166、142、130.
- [4] 楼大为. 以平台化思维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杭州市“同心荟”统战工作平台的实践与思考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报, 2018 (2): 47.

责任编辑: 吉强

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助力海内外情感融合 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

本刊编辑部

摘要: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2022年7月19日,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正学论坛’暨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助力海内外情感融合学术研讨会”。来自统战部门、高校、社院的专家学者以线上交流形式,作了精彩发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的重要性、紧迫性、针对性,积极探索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的新道路,不断创新方式载体,进一步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

关键词:正学论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情感融合;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72-05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夯实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情感纽带和思想基础

徐东海^①

近年来,江苏省委统战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积极配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情感纽带和思想基础。

一、坚持高点站位,服务中心大局

一是注重谋划布局。为落实《国家海外华文教育发展规划》,起草江苏的《实施意见》,并以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印发。江苏省被

中央统战部指定为开展华文教育精准帮扶的7个试点省份之一。省委统战部联合省商务厅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海外惠侨工程中餐繁荣工作的意见》,并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医惠侨工作的意见》。这两份文件系全国首创,文件中的相关内容被中央统战部《每日汇报》采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时任国侨办主任潘岳在江苏调研时,对江苏的华文教育、中医和中餐惠侨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二是聚焦重点工作。2020年初,面对新冠肺炎

收稿日期:2022-07-19

注:①徐东海,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注:

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省委统战部紧紧围绕省委决策部署，充分整合各方资源，积极搭建各类惠侨平台，扎实开展“江苏侨爱援助行动”，助力海外侨胞强身、健体、养心，切实把省委、省政府和家乡人民的关心关切关爱体现到实实在在的援助行动上，倾情助力海外侨胞抗击疫情。

三是加强统筹协调。相关单位联合成立“江苏省中华文化海外交流基地”，并以此为契机，逐步建立信息交流、协商合作的机制，共同构筑中华文化海外交流资源共享平台。截至目前，全省13个设区市共有文化交流基地83家，形成了上下联动、互相支持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合力，共同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全省努力把“基地”建设成对外交流文化、展示文化成果、增进友谊、广交朋友的平台。

二、突出江苏特色，打造亮丽文化名片

努力打造传承中华文化、展示精彩江苏的亮丽名片和金字招牌，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来展示自身价值，对外讲好江苏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华文化。

一是持续深耕特色品牌。自2016年起，在海外连续举办“秦淮灯会”和“水韵江苏摄影图片展”。2021年和2022年的元宵节期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江苏文化嘉年华暨多伦多秦淮灯会”和“水韵江苏图片展”，活动采取线下定制、线上直播、线上猜谜、驾车参观、室外赏灯等多种形式举行，覆盖受众超50万人。

二是不断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根据不同国家和侨胞的需求，积极开展多层次、多类型、多方位侨务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中医保健、美食厨艺、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名品推介、招商宣传等。多措并举大力支持“中医、中餐惠侨”工程，积极推进省中华文化海外交流基地和海内外古镇联盟建设，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省内优质文化资源“走出去”“融进去”，以人文交流，促民心相通。连续多年支持美国旅美华人科技协会、意大利佛罗伦萨华星艺术团等海外侨团举办华人

春晚等文化活动。2022年4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促进中日两国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应日本名古屋华助中心的邀请，协调指导南京小红花艺术团以视频方式，与名古屋水莲舞蹈艺术学校联合主办了“第一届日中青少年舞蹈艺术文化节”，把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江苏特色文化展现给海外民众，进一步促进中外民心相融、拓展海外友好合作朋友圈。

三是把握时机优化升级品牌活动。以海外“秦淮灯会”“水韵江苏摄影图片展”为基础，结合多种文化交流形式，升级打造海外“江苏文化周”和“江苏文化嘉年华”。为庆祝中马建交45周年，2019年1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和马六甲两地举办了“江苏文化周”活动，共展出图片120幅、花灯4164个、名家书画60幅、非遗产品7类（160件），38个国家的41位武官夫人赴现场参观，上千名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参加活动。

三、搭建平台载体，创新方式方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文化交流的不利影响，创新方法开展一系列线上线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努力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少年、华侨华人足不出户就能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是开辟“互联网+文化交流”新模式。指导中医惠侨基地设立“云诊所”，对海外华侨华人开展中医关怀；研发抗疫“云美食”，开展中餐繁荣网上课堂“云教学”“云旅游”“云美食”等特色视频教学项目；面向德国、西班牙、波兰、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60多所华校，开设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云课堂”；连续举办“海外华裔菁英青少年大运河文化线上体验活动”等文化交流“云体验”活动；举办“一带一路”华校行知教育线上论坛。各式各样的云端文化活动拉近了海外华侨华人与江苏的情感距离。

二是首创品牌活动。在全国首创“百所华校云牵手”，鼓励支持省内学校与海外华校结成友好合作关系；开全国之先河，编写《中华文化大乐园活动课程指南》（第一辑、第二辑），填补中华文化大

乐园教材的空白；与国侨办华文教育基地之一的南京师范大学合作，创办首个海外中小学华文教师网络研习班，帮助海外华校提升教师素质。

三是拓展合作渠道。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合作，举办全省华文教育基地负责人培训班，共同打造更为优质广阔的华文教育“朋友圈”。

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的困局与新局

彭宗超^① 路璐^②

一、直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挑战

一是国际舆论圈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不断升级演化，在政治、学术等层面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和它伴生的舆情问题，对中华文化的海外正常传播带来严峻挑战。全球范围内，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认知受到了疫情影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观导致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对中国作出负面评价。三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差距凸显。已有调研表明，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的印象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一代（10岁到20岁左右的群体）在认知方面有差距。

二、走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当下困局

在充分发挥多元传播主体作用的同时，还要在海外的意见市场和情感市场两方面综合施策。过去，我们可能比较偏重意见市场，但对情感市场的关注不够。这需要在情感市场方面给予进一步重视，以更大力度加以推进。在海外传播中，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意见的沟通，但更需要去做情感的培育，更重视情感市场和情感资本的作用。情感市场的培育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我们全方位地去谋划，在相知、相交、相融的交流互动过程中不断推进。

三、开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未来新局

要重视多元逻辑、多元共生、多元共识的跨

文化和合式的传播认识论和方法论，设计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跨文化传播的立体渠道，加快推进中国故事、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例如，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像大山似的外国人，他们自己“来中国”，离开中国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能够去说中国的相声；谷爱凌这样的华侨“回家来”，不仅是回家了，而且为我们争夺世界的金牌，这种文化的传播，其效益可能远大于一般的项目。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目标不仅是“传出去”；而且是能够“融进去”，融入当地、融入世界，进而能够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感染一切可及的人。“融进去”是未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侧重点。其中，需注意三点。一是尊重传播规律，增强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要不断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做到从“多国一策”到“一国多策”“一国一策”“一区一策”，甚至“一人一策”的转变。二是重视线上和线下结合。如何在混合式的平台当中构建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如何充分运用新兴传播技术，这些需要及早布局，最终实现跨文化传播中的传受同构、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三是巧妙借力提升国际化合作的影响力。要利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甚至国外的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和渠道发出中国声音，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

注：①彭宗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②路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需要什么样的海内外情感融合

王晓芸^①

一、如何理解海内外情感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舆论环境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认清世界文化传播的形势和格局，抓住机遇，探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道路，在国际对话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

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传而难通”的尴尬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例如，长期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主要依靠孔子学院等官方渠道进行海外传播，在中西“对立”的政治语境下，这种传播方式的实效受到一定制约。我国对外传播中的一个重要民间代表人物是李子柒，她是“最多订阅量的YouTube中文频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央视新闻评价李子柒：“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她以个体叙事角度呈现的日常生活图景，构成了与海外公众情感连接的接触点，由此实现了超越个体的叙事过程，在情感连接的基础上产生了共情与认同。

情感属于心理学范畴。情感被认为是高级生命体在考察外界事物能否满足其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态度、主观体验或者主观心理倾向。情感融合，是指参与主体在共情约定下，以情感为互动的纽带，逐步共同构建意义，最终达成共同理解的一个多阶段的交流体验过程。情感融合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能在精神层面凝聚社会共识。

二、中华文化海外交流传播需要什么样的海内外情感融合

一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情感融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单打独斗还是携手合作、是以邻为壑还是互利共赢，这是各国必须面

对的时代选择。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中的“天下”观念与西方就有很大的差异。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持续蔓延，使跨文化共情传播更显重要。

二是应对国际社会多元化诉求的情感融合。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结构中，不同的个体身份会产生不同的诉求。特纳在《情感社会学》中介绍了身份控制理论，指出了人们的身份与诉求之间的关系。“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中行动，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位置和互动角色的占据者，当人们互动时，他们尽可能寻求保持某种特定的身份。”所以，要预测对方如何行动，就要锚定国际社会因不同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和基本国情的差异而存在的多元化情感诉求。

三是构建中华文化自我身份认同的情感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要体现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要有助于增强中国软实力。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如此定义软实力：“假如说硬碰硬实力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那么软实力就是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的。硬实力发挥威慑功能，软实力起诱惑作用；硬实力发挥劝诫功能，软实力起说服作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要借鉴国际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打造文化软实力。

注：① 王晓芸，西安市委党校副教授。

做好基层侨务工作 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喻迎春^①

做好基层侨务工作，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一是要拓宽海外联谊联络的渠道和空间，广交海外朋友，密切沟通联系，积极发挥海外侨领、侨团组织作用，努力牵线搭桥，这是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基础；二是要扎实做好为侨服务工作，切实维护和保障境内侨眷侨属的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这是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情感纽带；三是要积极发掘民间外宣、民间外交、民间华文教育的内涵，调动海外侨胞、侨领和侨团组织的积极性，创新载体，搭建平台，以形式多样的活动和华侨华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是加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增进情感融合的关键举措；四是要挖掘富有特色的工艺、绘画、美食、特产、文物、曲艺等传统文化产品，通过海外传播，让海外华侨华人增进家乡情结、记得住乡愁，这是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情感融合的重要内容；五是要坚持“大侨务”工作理念，加强侨务部门与宣传、文化、教育、商务等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商会、社团组织的联系协作，寻求多方支持和配合，推动形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强大合力，这是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情感融合的支撑力量。

做好基层侨务工作，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关键要解决“向谁传播”“传播什么”“怎么传播”的问题。要把握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多样性和差

异性，尊重不同国家多样文明和文化差异，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情感融合。一是拓宽海外传播渠道，实现传播渠道多元化。充分发挥海外侨胞、侨领、侨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和海内外传播媒体平台作用，加强和海外宣传机构的联系、对接与合作，并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种途径增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力。二是注重海外传播方式，突出民间性。坚持中华文化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民间外宣、民间外交、民间华文教育的优势，整合多方资源，以华侨华人和海外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三是丰富海外传播内容，增强内容的多样性。坚持因地制宜，着力挖掘各地传统文化中可以展示推广的内容，如京剧、国画、乐器、美食等，加以多样化呈现。加强海外宣传、推广、展示和交流，扩大中华文化海外影响力。四是增进海外传播力量，进一步增强实效性。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加强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推动侨务工作与各级教育文化部门、文化团体、文化协会加强联系协作。同时，在政策上给予适当倾斜，加强基层统战（侨务）工作力量，提升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实效。

责任编辑：尔东

注：①喻迎春，南通市通州区委统战部（侨办）副主任。

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原则、境遇及有效路径

王万奇 贺伟华

摘要:“形势与政策”课建设是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更是新形势下保证“形势与政策”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坚持“形势与政策”课的时效性与实效性相统一、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是建设形势与政策“金课”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客观分析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的现实境遇,从而做到思想上重视、教法上优化、力量上加大,以此来助推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

关键词:思政课;形势与政策;金课;立德树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4-00077-04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观摩思政课智慧教室现场教学时,再次提及思政课教学“金课”建设,并强调思政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一时间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重要课程。”^[1]新形势下科学把握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基本原则,了解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现实境遇,对于构建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有效路径尤为重要。

一、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基本原则

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必须遵循基本的教

育规律,坚持正确的教学方向,始终坚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这就要求,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必须遵循时效性和实效性相统一、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等基本原则。

(一) 时效性与实效性相统一

时效性与实效性相统一,是依据形势与政策“金课”的研究对象来决定的。“形势”与“政策”作为形势与政策“金课”的研究对象,其中“形势”主要指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势以及未来发展态势和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形势以及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态势。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形势,其都具有变幻性。“政策”主要指党和国家在一定

收稿日期:2022-06-04

作者简介:王万奇,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贺伟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21年度一般项目“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创新研究”(21BKS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形势”的变换发展，对于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旦失去了时效性，那么“金课”建设就会失“势”，也就背离了“形势与政策”课建设的初衷，没有办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广大学生始终站在时代前端。“政策”的客观性、指导性，特别是实操性，对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实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旦失去了实效性，那么“金课”建设也就会失“策”，就没有办法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引导广大学生了解最新的政策。综上所述，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必须遵循时效性与实效性相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研究对象。

（二）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统一

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统一，是依据形势与政策“金课”的教学内容来决定的。任何一门课程要称得上“金课”，首先必须坚持内容为王。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同样需要坚持内容为王。形势与政策“金课”的内容建设可以分为稳定与动态两个部分。稳定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指形势与政策“金课”的基础理论部分，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重要历史决议以及纲领性文件等；动态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指国内外最新热点以及各行业各方面的最新形势。形势与政策“金课”稳定部分是“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理论部分，是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价值旨归和指导思想；形势与政策“金课”的动态部分是“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时内容和思想载体。“相对稳定部分是这门课的基础，决定该课程的性质，动态变化部分是这门课的亮点，反映该课程的特色。”^[2]因此，在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中不仅要把握国内外最新形势，解读最新政策，更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统一。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是依据形势与政策“金课”的教学形式来决定的。“形势与政策”课因其课程性质的独特性，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教学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教育手段。“形势与政策”课作为一种理论性和思想性兼具的“交叉课程”，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而且具有极强的思想引领性，是教学性与教育性并存的一门课程。早在 2004 年，由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就曾明确提出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管理。近些年来，“形势与政策”课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教学计划、教学要求、教学组织、学时、学分、教学档案、考核制度等方面不断规范。此外，“形势与政策”课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形势与政策”课的上课环境既可以选择在传统的教室里，也可以选择特定的教学环境中，同样也可采用网上学习的形式；“形势与政策”课的上课形式既可以是一般的课堂交流，也可以是在特定时间的主题报告会、研讨会。综上所述，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一定要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二、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现实境遇

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是高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认识不清晰可能导致课程地位边缘化；教法欠灵活可能导致课程效果微弱化；力量不充足可能导致师资配备薄弱化。

（一）认识不清晰可能导致形势与政策“金课”的课程地位边缘化

认识上的不清晰，导致“形势与政策”课被边缘化。首先是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不够清晰。个别学生把每学期 8 个课时的“形势与政策”课与其他思政课或专业课做对比，因“形势与政策”课课时短而出现了误解，认为“形势与政策”课不重要。除此之外，“形势与政策”课每学期 0.5 个学分的设置，导致学生误认为“形

势与政策”课并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与此同时,个别授课教师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同样不清晰。授课教师大多情况下每学期只需要进行2次授课,共计8个学时,教师与学生的接触时间短,学校难以全面考核“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的教育成果,这导致个别教师在“形势与政策”课教授过程中得过且过,不能做到每一次课程讲授都能用心用力。加之“形势与政策”课上课时间大多安排在周末,导致个别教师和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从情感上就产生排斥情绪,进而认知上出现了偏差,使得“形势与政策”课的地位可能被边缘化。

(二)教法欠灵活可能导致形势与政策“金课”的课程效果微弱化

思想的共鸣往往需要情感的互通。教学方法的单一是目前影响“形势与政策”课发展的重要障碍。当前,大部分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采用大班教学,而且一名任课教师普遍在一学期内只有2次授课的机会,这势必导致学生和教师很难产生情感上的互通。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学生表示,自己对于一个陌生的教师讲述的东西的理解度普遍要低于一个熟悉的教师的讲述内容。很显然大班式教学和短时间的授课不利于形势与政策“金课”的建设。由此还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很难在短时间内结合一个班学生的兴趣特点和他们的专业特色,去设定更有创意的课程,灌输式和说教式的现象成了“形势与政策”课课堂上的普遍现象,这可能导致形势与政策“金课”的课程效果微弱化。

(三)力量不充足可能导致形势与政策“金课”师资配备薄弱化

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中的一支青年军,成立时间普遍较短,自然就导致师资配备相对薄弱。调查显示,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的专任教师队伍往往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队伍中人数最少的一支。而“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的构成往往由形式与政策教研室的教师和其他

非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的教师构成。这些非形势与政策教研室的教师有的来自其他教研室,也有一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之外的教师,教师的构成较为复杂。这些非教研室的教师,往往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设置目的和上课要求缺乏科学的认识,而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往往对于非自己教研室的教师缺乏必要的引导、管理和监督,这就导致整个上课队伍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整体来看,当前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力量不充足可能导致形势与政策“金课”师资配备薄弱化。

三、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有效路径

形式与政策“金课”建设需要行之有效的路径,这就要求在建设过程中,做到思想上重视、教法上优化、力量上加大。

(一)从思想上重视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观摩思政课智慧教室现场教学时,将“重不重视”看作思政课发挥应有作用的首要因素。从思想上重视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应当做到以下几点:其一,高校思政课负责部门要重视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要把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与其他思政课“金课”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给予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支持,鼓励任课教师大胆创新;其二,“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要重视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把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看作立德树人的关键,用心、用情、用力讲好每一堂“形势与政策”课;其三,引导学生要走出以往对“形势与政策”课认识的误区,让他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的学习是提升自己分析形势和把握政策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自己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渠道。

(二)从教法上优化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

教学方法的优化,是提升“形势与政策”课吸引力的关键,是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必由之路。针对当前大多数学校“形势与政策”课课时少、任课老师不固定的现象,要建立四年任课教师相对固定的模式。只有这样,任课教师才能在四年中,通过每学期的交流与学生们建立

感情,进而长时间跟踪学生的思想动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稳定的教学关系,是制定长时间教学计划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还要给予学生自主选择任课教师的权力。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实际需要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任课教师,实现师生的有效互动。在相对固定的师生关系中,任课教师才可以依据学生的专业特色,结合最新国内外局势变化、大政方针的制定,更好地安排自己的教学内容,优化自己的教学设计,进而有效推进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

(三) 从力量上加大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配齐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思政课教师队伍”^[1]。加大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力量,要扩充“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数量。对此,主管部门应加大“形势与政策”课专任教师的引进力度,并在条件允许时固定兼职教师,从而在人数上确保“形势与政策”课的授课力量。另一方面,要建设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队伍,是塑造学生

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是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关键所在。在“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队伍建设中,对专兼职任课教师都要做到严要求、高标准,不断提升“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的整体实力,进而锻造一支拥有渊博知识的“经师”,造就一批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师”,让“形势与政策”课的讲台上有更多的“大先生”。只有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同时加大“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队伍的建设,才能真正确保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

参考文献:

- [1] 程琼,王洛忠.形势与政策“金课”建设的标准与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0(5):64.
- [2] 卢保娣.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问题及消解途径[J].教育与职业,2016(23):94.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1.

责任编辑:尔东